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黑格尔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黑格尔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一	在斯图加特.....	004
二	在图宾根.....	015
三	在伯尔尼.....	023
四	在法兰克福.....	033
五	在耶拿.....	043
六	在班堡.....	069
七	在纽伦堡.....	072
八	在海德堡.....	080
九	在柏林.....	087

前 言

海涅曾拿法国的行动者与德国的思想家们相比。他说，就破坏和严峻后果而言，罗伯斯庇尔可以和康德相匹敌；就意志的狂放和抱负的远大，拿破仑可以和费希特并肩；而就全面的继承人类的精神事业，充分表述十八九世纪之交的根本变化，没有一个法国人可以和黑格尔同日而语。

恩格斯也曾经说过：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近代欧洲最著名的辩证法大师。他在人类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在他那里，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至今还让人惊奇不已的丰富思想，它们如璀璨的宝珠在人类思想的宝库中放出夺目的光彩，让后人在它面前赞叹不已。黑格尔一生中著作等身，在知识领域中，黑格尔可以说是一个巍然屹立的巨人。

有一位思想家罗森克朗茨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哲学家的历史就是他的思想历史，他的体系发生形成的历史。”用这句话来形容黑格尔的一生非常恰当。黑格尔同其他哲学家相比，属于大器晚成那一类，他足足用了15年时间攀登哲学的高峰，随后他的哲学便超过了谢林哲学，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在哲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曾有人这样评价黑格尔的一生：“黑格尔的生平是死板枯燥的，几乎没有什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外部事件”，“与历史上其他著名哲学家比起来，黑格尔的生平可以说是最平凡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本书依据地点的变迁来分期叙说黑格尔的生平，其中自有回答。

一 在斯图加特

1770年8月27日，德国西南部符腾堡省的斯图加特城里，路德派基督教徒乔治·路德维希·黑格尔的家里，几声“哇哇”的啼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是个男孩，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符腾堡省是德国许多诸侯封建统治的典型小邦之一，西部邻近法国，南部与瑞士接壤，得地之利，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运动的影响要近一些和快一些。

黑格尔的远祖是一个新教教徒，祖父是路德新教的牧师，诗人席勒诞生时就是由他主持洗礼的。黑格尔的父亲老黑格尔在卡尔·欧根公爵府税务局任书记官，后来任运输局的顾问。黑格尔的母亲玛丽亚·玛格达伦娜·黑格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黑格尔在家里是长子，在他之下还有一妹一弟，妹妹名叫克里斯蒂娜·路易丝·黑格尔，生于1773年；弟弟名叫乔治·鲁德威·黑格尔，生于1775年。黑格尔同妹妹之间的感情很好。

黑格尔家境中道，使黑格尔有可能受到良好的教

育。黑格尔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黑格尔 5 岁时便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黑格尔学习语文，对他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热情鼓励黑格尔所取得的点滴进步，卓有成效。

黑格尔在 7 岁时进城内新教拉丁学校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他是一个模范学生，每次都因成绩优良获得奖学金。他的父母还请教师于课外替他补习几何学、希腊文、拉丁文，这为他阅读古典文学、哲学，根据希腊文、拉丁文的原始材料讲哲学史打下了基础。因为黑格尔学习上勤奋上进，平日循规蹈矩，深得老师洛佛勒尔的赏识疼爱，并于 1778 年惠赠德文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八卷，并告诉黑格尔：“你现在还不能学习这些书，但你不久就会读懂它们。”洛佛勒尔死后，其妻又将其藏书数册转送于黑格尔。黑格尔后来称洛佛勒尔为他的“最敬爱的老师”。洛佛勒尔老师慧眼识珠，几十年以后他所识出的“千里马”驰骋万里，声振全球，他若魂魄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的。

洛佛勒尔老师生前不仅赠书给黑格尔，还曾私下两度教过黑格尔，一次是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听老师解释库尔梯乌，伊索寓言和新约全书；另一次是他一个人听老师讲论西塞写的几封哲学书和保罗致罗马人与帖撒罗尼加人书信，诵读圣诗，还讲一点希伯来的东

西。

这位可爱的老师于1785年7月6日逝世，黑格尔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纪念他：

洛佛勒尔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特别是在我中学低年级时，我敢说他几乎是最优秀的。他为人公正无私，一心为学生，为众人谋福利。他不愿别人那样思想庸俗，以为只要能把那种古旧的，年年稍事更改的班级惯例推行下去，他们就有了生计，而不需要学习提高。不，我的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了解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给一个人的安慰。我们经常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促膝相谈，那是多么快乐啊！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功绩。像他这样一个人，竟完全限制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现在，他已经常眠了！但我将永远地、始终不渝地怀念他。

这篇虔诚而又聪慧也有几分少年老成的日记，就是这个十五岁的学生怀着对老师的纯真的沉痛心情写下的。他回忆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亲切聚谈的感人景象，完全出于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

1780年黑格尔10岁时进文科中学读书。这个时期正是德国文学伟大兴起的时期。歌德的《葛

慈·封·白尔利星根》(1773)、《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克拉维歌》、《史台拉》问世了；莱辛的《爱弥丽亚·迦绿蒂》(1772)、《智者拉旦》(1779)也出版了；1781年6月席勒的《强盗》出版，次年九月出版共和国的悲剧《菲斯柯》，最后又完成了他的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所有这些具有不朽意义和魅力的作品，都没有引起黑格尔这位斯图亚特中学生的充分注意。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竟发现中学时期的黑格尔最喜爱的小说是《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这在黑格尔1787年元月1日的日记中有记载。《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是当时德国文学中一部贫乏的，令人厌倦的作品；厚厚的六大卷，有无数的信札还带有无数的附录和续编；写的是一个少女的命运和冒险行为的故事。这个少女在七年战争最后时期，当俄国人占领东鲁士之际，为了探寻她养母的被丢失了的儿子的命运和下落，从默墨尔旅行到德累斯顿。小说的作者是约翰·提摩太乌斯·赫尔墨斯，席勒在他的讽刺诗中曾用“拉丁传教士”来谴责他。然而，就是这部如此贫乏无聊的小说使黑格尔入了迷，以至于废寝忘食。当叔本华在罗森克朗茨写的黑格尔传记中读到他的日记的那段记载时，他在给他的学生尔·贝尔的信中带着胜利的心情写道：

我最心爱的作品是《荷马》，而黑格尔最心爱的作品却是《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

少年黑格尔极其喜欢读书。他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几乎把零用钱都用来买书，阅读了许多书籍，还把读过的书详细摘录在一张张活页纸上，然后按照语言学、美学、哲学、神学、史学、心理学、几何学、数学、教育学等分门另类加以排列，这种读书习惯伴随了黑格尔一生，使得黑格尔博闻强记，受益终生。黑格尔的这种严肃认真的读书方式使他不仅把握了所读过著作的概括意义，而且能深刻领会到其独特之处，体味作者的个性的微妙趣味。这一习惯的形成与黑格尔严谨冷静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黑格尔认为：“真正的素养必始于坚决地抹去自己，如在毕泰格拉教育制度里面，学生起初五年不许作声。”

黑格尔一向学习刻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笔头勤快，笔记做得很认真，他的作文，老师们的评语总是很好。在高年级时，黑格尔曾参加过三次演讲，题目分别是：安东尼、屋大维和雷比达关于三头政治对话；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论古代诗人的若干特性，给人的印象是“很不行的演说家”。

在文科中学时，黑格尔开始记日记。中学生记日

记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黑格尔的日记是看起来没有情感的波澜，语言也毫无风格，倒像流水帐目。这一点从以下几篇日记中即可看出。

星期四，7月14日。阿贝尔和堆普夫两位教授日前光临我们的聚会。我们和他们两位（！）一起散步，他们专门给我们谈了维也纳。

星期五，7月15日。我和克苗斯教授一起散步，我们很入神地谈了德尔松的《斐多》……

星期六，7月16日。市府秘书克拉普夫勒先生今天去世了，大家原来以为他的健康已有所好转呢。他身后遗下9个孩子，一个儿子在8天前接替了他的职位；一个儿子在去年秋天进了修道院。

……

这些日记表明黑格尔记录客观，为人冷静。以至黑格尔研究专家开尔德说：黑格尔的日记也老成持重，充满学究气。但这只是一面，在日记中，黑格尔也记录些颇有兴味的，平凡生活中的矛盾，“诙谐冲突”。

星期二，6月28日（1785年），我今天才发现如何同是一样东西可以给各个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印象……我吃樱桃，觉得其味甚美。并且尽量享受，

……但同时一个比我年纪大些的人，便不感觉兴味。他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卖樱桃的女人身边走过，未有不流口涎的。但及年纪一大，我可以眼看着春天过去，一点也不渴望吃那东西。因此我就悟到一个令人痛心的至理，就是年轻之时，想吃不得吃，年老之时，有吃不想吃。

1月3日，全部月食。校中备有天文仪器，许多人聚此观看，但天为云所翳。于是校长告诉我们如下故事：“儿时，他同别的孩子有一次夜间偷跑出校外玩，籍口是观星。警察看见他们，打算把他们带到看守所。这些孩子们说到：‘我们在看星宿。’‘不行’警察答道；‘小孩子在夜晚应该上床去睡觉。到白天才准出来看星星’。”

吃樱桃，看星星这些事虽小，但对我们了解黑格尔却很有启发意义。记载起这些矛盾趣事来，黑格尔一反他记陈年老帐的刻板常态，写得兴趣盎然耐人寻味，足见黑格尔深喜矛盾。

少年黑格尔虽然兴趣广泛，但尤其喜爱古希腊古典文学和听音乐会，这两大兴趣，黑格尔无论处于何地，何等条件下，都丝毫不改，毕生未减。黑格尔在这时期醉心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尼得斯的悲剧，曾以散文、韵文的形式两次翻译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里》，

并写了两篇作文：一为1788年所写的《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其中指出：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在某些特征上是有差别的。古代诗人的优秀品质和无可争辩的长处在于纯朴，他们的思想不是取自书本，而是直接来源于生活和自然，他们所关心的，是为真理服务而不是取悦于读者。因此现代诗人再也起不到古代诗人那样大的作用。此文所获得的评语是：“前途不可限量”；其二为黑格尔中学毕业时为告别辞所写的《土耳其人文艺与科学之衰落》，这是一篇演讲辞。黑格尔在这个演讲中，一方面勾画出奥斯曼帝国的悲惨状况，另一方面呼吁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符腾堡，对比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从各个方面看，斯图加特都远比土耳其好，而这应归功于公爵（格卡尔·欧根公爵）和老师们的。

黑格尔认为，希腊古典文学是培养鉴赏力的学校；希腊史学家的作品是记载历史的典范，极有助于理解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希腊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发源地。黑格尔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是一切使生活满足，使生活高尚，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或间接得自希腊，谈到希腊哲学，我们就好像回到了精神家园”。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培养了黑格尔的启蒙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黑格尔一度曾喜欢的是希腊教而不是基督教。他写了一本《耶稣传》，先于斯特劳

斯和勒南提出耶稣是玛丽和约瑟夫的儿子，剔除了一些神奇因素。但是后来，他又自己销毁了这本书。

黑格尔中学时期哲学兴趣表现在大段抄录洛克、休谟和康德的著作。他设置了一个笔记本，从1785年起，专门搜集各种定义，其中包含有关于迷信、美、哲学、逻辑、变化、国家等等的定义。他抄录的哲学的定义是：深入到人对最重要的道理的概念和知识的根据和内在性质。逻辑的定义是：研究从人的历史里抽象出来的思维规律的整个内容。变化的定义是：如果可以归结一个东西有两个正反相对的规定性，其一停止起作用，而其他开始起作用时，则这个东西就可以叫做变化了。

从黑格尔妹妹的遗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黑格尔小时候身体很虚弱，曾经历过几次重病的袭击，几乎丧命，但最后总算是又活了过来。真乃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黑格尔在天岁时得过天花，盲目了好几天，医生都认为他一定会丧命的，但他奇迹般地好转过来了；在黑格尔13岁时，斯图加特一带同时流行严重的胆汁性痢疾和胆汁性热病，他们全家都受到感染，黑格尔的母亲因此很快去世了。黑格尔本人也病得特别厉害，已经有了扁桃体腺肿症状，人们都怀疑他是否能活得下去，不久病虽好了，耳后又生一恶疔，为此又施行了一次痛苦的手术。

黑格尔母亲的去世，黑格尔三兄妹深感悲痛。直到1825年，黑格尔在他母亲去世的日子，还写信给他的妹妹说：“今天是我们的母亲去世的日子，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事隔多年，记忆仍这么清晰，念念不忘，足见黑格尔与其母亲之间的母子情深，令人感动。

在谈到黑格尔思想的形成时，我们不能不提到法国启蒙运动对黑格尔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启蒙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杰出思想家、理论家，坚韧不拔的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反对专制压迫和宗教迷信、教权主义。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一度出入普鲁士宫廷，卢梭的《爱弥儿》则风靡全欧，《法国百科全书》销行全国，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各国启蒙运动，形成了全欧性的启蒙时代，引发了各地教育改革。

黑格尔阅读和摘录了大量启蒙运动者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他宣称这些书籍使他从传统偏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黑格尔推崇理性，强调人的权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由平等权，人的理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个人的情感和愿望必须受到尊重。黑格尔在《论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宗教》一文中尖锐地抨击宗教迷信和崇拜。黑格尔认为：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愚昧和无知，上帝的观念是人

自己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主人”的模型而形成的。人把主人的一切特性赋予了上帝，所以上帝也具有人的一切特性。这实质上是说：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而是人根据自己的特性塑造上帝的形象，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为了神的惩罚而对它顶礼膜拜，为了摆脱灾难而求助于神，对它奉贡祈祷。诚然，黑格尔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在他的宗教观点中所强调的是人而不是神，因此黑格尔认为，有理性的人是不会把幸福归之于神的恩赐，他们会认为神只不过给予人以有充分的手段，但还须靠个人自己努力取得，所以真正的幸福是通过智慧和道德的完善而达到的。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能力，必须加强教育，教育对一个民族有着重大意义。黑格尔把教育看成是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 在图宾根

1788年10月，黑格尔、荷尔德林因中学毕业成绩优秀，得到斯图加特、毛尔布隆两地保送，同时入学到图宾根神学院读书。

图宾根神学院设在从前一个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的故址，是专门为各地培养牧师和教员而设立的，学员二三百名，享受公爵所设奖学金待遇。黑格尔是这个学院的公费生。这里的生活方式也具有修道院的特色。学生们奉命早起，祷告和吃早饭、上课、自修和散步都有严格的规定。

再过两年，年方15岁的谢林也来到图宾根神学院。少年时期的谢林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年满17岁方能进入图宾根神学院，谢林以其出众的才华被破例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同住一室，朝夕相处，结下了诚挚的友谊，这友谊持续了很多年。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激起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情绪。恩格斯曾经指出：“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

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

法国大革命的劲风也吹到了图宾根神学院的校园。神学生们在刻板的生活和黑色道袍下，激荡着立志改革落后德国的火热炽情，向往着革命和自由。

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在图宾根神学院读书期间，正值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德国的进步力量热烈欢呼法国革命。图宾根也出现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人们在那里交流有关法国事件的新闻，阅读法国报纸，谈论德国命运。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都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在内加尔河岸栽自由树的活动。黑格尔曾在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关于博爱与自由的演说，受到朋友们的一致喝采。在黑格尔当时的纪念册上记着“反对暴君”、“打倒坏蛋”、“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政”、“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等革命口号，还摘抄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名言：“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谢林则把同学魏采尔从法国带回的《马赛曲》译成德文，在同伴中传唱。这件事惹怒了封建当权派。主张取缔思想自由的欧根公爵把神学院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对谢林与其他几个学生严厉训斥。公爵问谢林，他是否就是那个“强盗歌”的译者，谢林一直都无所畏惧，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盯着公爵，简短而干脆地回答：“阁下，我们大家缺乏各式各样的思想，”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最后仅仅由于谢林的父亲及时拜托神学院校长施努黎尔从中斡旋，谢林才未被开除出神学院。

3位朋友的心是在一起的，事业是共同的。他们倾向于改革，憧憬于未来，以“上帝之国”的口号互相勉励，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黑格尔写的两句诗：

是对真理和自由无保留的献身，
是对禁锢思想诫律永不妥协的誓言。

黑格尔终其一生对法国大革命都持积极态度。谈起这场革命，黑格尔总是兴高采烈的。他写道：“法国由它的革命的涤荡，脱却了许多制度。那些制度是人类精神掉在背后的孩提时的敝履，曾重压过它（指法国），如现在还重压着其它各国一样，像枯槁的羽毛一般。”正是在那些充满希望，“风华正茂”的日子里，黑格尔像费希特一样，亲近过一阵某种贵族式的社会主义，并以其特有的热情，投入了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潮流之中。

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少年热情，是始终如一的，使他在哲学上认识上都贯彻着法国革命的理想。直到晚年，他也未忘掉在7月14日为攻克巴士底狱干一杯。在1827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法国首都巴黎的

时候，寻找过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最重大事件的场所，并且对卢梭住过的庄园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在晚年讲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仍旧热情歌颂法国革命的理想：

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它的头脑，它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阿那克隆哥拉第一学说“V o”(理想)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所以，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

这曾终被恩格斯称作是“危险的颠复学说”。

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了五年，前两年主要学神学，后三年主要学哲学。在这五年中，黑格尔选习了这样一些课程：福音史，旧约诗篇研究，西塞罗论神的本性，哲学史，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路加、马太、约翰诸福音和保罗人告罗马人书。此外，他自己还选习了一门解剖学的课程。在大学期间，他没有听过逻辑的课程，据说可能因逻辑教授去世，一时没

有人担任的缘故，虽然在中学时他就接触到活尔夫的逻辑教本。在教授中，讲授西塞罗的“论神的本性”和“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的佛拉特教授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敏锐而自由的支持者。正如他给友人谢林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对大学的讲授不很满意，但在自学与积累知识方面用了很大的力量。

在图宾根神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他还和中学时一样，对其他方面的活动不感兴趣，只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他忽视骑马术和击剑术的训练。在和少女相处时，呆若木鸡。他穿着粗俗、陈旧；行动呆滞、迟缓，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小老头儿”。有个同学曾在他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驼背，拄着双拐的黑格尔漫画，并在旁边题辞道：“愿上帝保佑这位小老头儿！”

俗语说得好：“人不可貌相”，多年以后正是这位“小老头儿”掀起了一股新的哲学潮流，它的声势是那么的浩大，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住，同时又有许多人从其中吸取了一些思想并进一步发挥，阐述，他们的哲学观点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很大影响。真可谓“源渊汉长”啊！

然而，黑格尔并不是一个落落寡合，行为鬼祟的人，而是一个开朗的，为人所喜爱的伙伴（“小老头儿”是善意的嘲讽）。他在愉快的酒宴上跟人们很合得来；在和朋友骑马到乡间时，竟忘记了规定的上课

时间，以致受到禁闭。他热恋一个漂亮的女孩奥古斯特·黑格尔·迈埃尔，已故神学教授的女儿，他甚至在赠给友人的芬克的纪念册上表示他如何不嫌弃酒和爱情：“上一个盛夏已经美满地结束了，现在更加美满！关于前者的格言是酒；关于后者的格言是爱！1791年10月7日。酒和爱!!!”

荷尔德林在纪念册中给黑格尔写下了歌德的彼拉得斯的词句：“兴趣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两翼。象征，万物一如。”

黑格尔要完成伟大行为需要两翼：一是对希腊世界的热爱，一是对哲学的兴趣。他的朋友中，最能促进前者的是荷尔德林，最后促进后者的是谢林。

在图宾根神学院，黑格尔阅读了刚刚问世不久的康德著作，但这时他并不理解批判哲学的精神。

八九十年代，康德的哲学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陆续问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康德亲自批判沃尔夫学派的各种观点，巨著之外，辅以散篇文章，发表于报刊。莱因霍德、费希特这些门徒广为传播，形成阵势。费希特亲自教学生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年以所撰《试评一切天启》亲自往见康德。《试评一切天启》于1792年4月顺利

问世，黑格尔一时间显然尚未充分注意并理解这一切，他正在观察思考。

黑格尔、荷尔德林、芬克、伦茨自共同进修弗拉特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神学课后，经常聚会阅读康德的理论著作。后来，得到助教“康德迷”迪茨的带动，兴致勃勃地探讨学院老师施托尔和弗拉特对康德所采取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做的阐释。黑格尔避免激进观点，采取中立态度。

此外，黑格尔、荷尔德林、芬克、伦茨四人还经常聚会阅读柏拉图。雅可比等人的理论著作。具体有：柏拉图的政治类对话——《国家篇》、《政治家施展》、《米诺斯篇》，以及《费德诺篇》、《蒂迈欧篇》、《斐多篇》、《会饮篇》，雅可比的《论斯宾诺沙学说的信札》（1785），希佩尔的《生命旅程》，赫尔德的《上帝，对话数篇》（Gott, 1781, 1800）等。其中雅可比、赫尔德两人的著作是围绕“关于淫神争论”而选读的。

黑格尔与同学伊特魏因关系很好。1839年，伊特魏因回忆这段同窗生活，谈及黑格尔爱读《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心目中的英雄是卢梭，卢梭的著作黑格尔都很熟悉，并对他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学完两年哲学课程之后，

于1790年9月，和荷尔德林、芬克、奥里斯特四人共同为伯克教授所撰论文《论义务的界限》辩护，结果顺利通过，成为哲学学士。三年神学课程完成之后，于1793年9月，和其他同学共9人共同校长勒贝雷特所撰写的关于符腾堡教会史论文辩护，顺利通过；获得结业证书，成绩平平。颇为有趣的是毕业文凭上述他天资、品性都好，长于神学和语言学，哲学上则没有能力。

三 在伯尔尼

1793年10月，黑格尔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征得教会当局的同意，准备绕开教会系统寻找职业，但承诺继续研究神学，报告学习情况，随时奉召担任神职。

符腾堡神学家的道路通常都是从神学院和候选经过代理职务到牧师之职。但这样一个目标对于黑格尔来说却没有什么诱人之处，因为他富有哲学的思维方式而缺乏牧师的激情，并且缺乏牧师的口才，是个“很不行的演说家”，于是黑格尔决定放弃神学，选择哲学。

黑格尔和谢林都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哲学。

1795年1月6日谢林致黑格尔的信中谈到：“上天降了一个大荒之年，陈年的莠草一起冒了出来，谁是除草之人呢？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哲学身上。”

神学院毕业后，荷尔德林结识了席勒。席勒非常赏识荷尔德林，认为他这位年轻的同乡最富有诗人气质，后来席勒把荷尔德林推荐给他的女友夏绿蒂·封·卡尔伯做家庭教师，这样，荷尔德林去了法兰克福。

黑格尔经斯图加特友人介绍，往南前往瑞士伯尔尼，到当地贵族，大咨议局议会成员，“伯尔尼的阁下先生”卡尔·弗里德里希·封·施泰格尔处担任家庭教师。施泰格尔的家住在楚格，因此黑格尔在一张由伯尔尼政府填发给他的旅行护照中被称为“亲爱的和忠诚的公民楚格的施泰格尔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受教的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黑格尔开始授课时，男孩弗里德里希·施泰格尔才七岁。

两年以后，谢林从神学院毕业，他操其父业，替父亲做过几次布道，但不久他发现“在牧师和教士的天地里，什么都受到限制，变得狭隘”。因此他放弃了神职，到斯图加特给两个贵族青年当家庭教师。1769年，谢林随他的学生迁到莱比锡。在莱比锡，谢林很快结识了自然科学家施泰劳斯，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史弟等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神学院毕业后，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这三位好朋友虽然天各一方，但往时的情谊依然萦绕着他们的情怀，不时互通书信，表达他们的深切感情。同时他们互相鼓励，交谈学问，在“对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上”共同前进。正如1795年1月黑格尔给谢林的信中所说的：“理性和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口号，无形的教会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目标。”

1795年5月，黑格尔作了一次去日内瓦的旅

行；次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还伴同三个萨克森的家庭教师，徒步攀登了阿尔卑斯山拉伯尔尼段。黑格尔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旅行。游览瑞士的丛山峻岭和终年秋雪的原野以及冰川、山溪与湖泊，这种阅历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却不是这样的。

在黑格尔的旅行印象的记录中，没有什么地方能看出他有点惊羨和感动的表示。他对巨大的山石和冰块、高峰和冰川无动于衷；对山谷和狭径感到阴郁而危急；对山河倾泻的不绝于耳的涛声感到厌倦而无聊；只有瀑布还能使他赏心悦目。他这样写道：“浪花悠闲自在地坠落飞舞，颇有些可爱之处，”他（指游客）所看到的瀑布永远是同一景象，同时又决不是同一景象，关于覆林德瓦尔德冰河，他写道：“凝视这些，兴致索然。”

黑格尔站在巍峨壮观的阿尔卑斯丛山之中，丝毫未感觉到造物主神一般的力量，在黑格尔看来，阿尔卑斯山是那么的僵硬而单调。对于这一点，有人评论说：“他注重审美的印象，而他的气质又使他不能突出这种印象，他过于诚实、坦率地对待自己而不愿伪装或蒙蔽他本人没有的感性；他具有某种不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任何怪物所压倒的东西。”

黑格尔随东家施泰格尔到他们一家在埃位赫的楚

格庄园。在那里，黑格尔利用东家丰富的藏书、古本，研读了休谟、孟德斯鸠、雷纳尔、席勒的历史政治著作，做了大量的摘要笔记。

尽管主人施泰格尔对黑格尔很亲切、平和，待遇也很优厚，可是远在他乡，只身一人，昔日的好友如今远在千里之外，黑格尔倍感寂寞与孤独，于是常和好友荷尔德林、谢林通信联系，互通音讯。

荷尔德林是一位极富才气的诗人，其创作后来被公认为可以和歌德、席勒并列在一起。他给黑格尔的信才情流畅、语言优美，在他的激发下，黑格尔写了一篇长诗：《赞歌》（副标题为：致荷尔德林），其中表达了黑格尔渴望与友人重逢的急切心情，诗文如下：

...脚下的湖水闪烁的微波，
向人们挟着深情的眼睛。
回忆躲开了永日的喧嚣
把自己和现在远隔，
像一场陈年的梦境。
亲爱的，你的身影，
伴随着逝去的欢娱，
又在我们的眼前浮现。
它惹起了再度相逢的希望，
象蜜汁样的甘甜。

我向自己描绘着这幕情景：
久渴望的拥抱火样燃烧，
无休止的问询宛如水潮，
暗暗地相互察看，窥探，
经过了一番别离之苦，
举止、音谈、对故人的情谊
是否有所改变， - -
令人高兴啊，使人欢欣
对友谊的忠诚，往日纽带
真挚，牢固胜似从前。

.....

思想越过河，飞过山
把我轻轻地带到你跟前。
但是，麻木的现实
却在无尽无休地纠缠。
一声叹息宣布了
愿望和现实的决裂，
随着这叹息之声
一切甜蜜的幻梦都烟消云散。

.....

从这篇诗文中，可以看出黑格尔非常重视友情，这也是他以后处处逢源，在艰难时刻总有朋友援助的

原因。

黑格尔和谢林的通信偏重于对哲学的问题的研讨，黑格尔由于远离文坛，杂务缠身，而谢林正在研究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后来又开始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于是谢林成了黑格尔在哲学道路上前进的引路人。

从二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和谢林对康德哲学抱有很大希望，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宗教学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日丽中天，将来总会为人之所共见。”“我从极其丰富的康德体系中，期待着在德意志大地上出现一个革命，这个革命要从现存的，并且还有必要的那些原则出发，通过合作的力量，来应用于迄今为止的全部知识。”谢林是这样评价康德学说与反康德就说的关系的：“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在高耸的山峰浴沐着太阳的光辉时，在谷地丛林中，这里那里还残留点迷雾，是不足怪的……”

在完成康德体系的道路上，黑格尔看到青年谢林正在向前开辟蹊径；他以有这位朋友而骄傲；他对谢林最初的两篇论文《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和《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所给予他的教益，充满感激之情。

我的至友，你送给我的论文和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深深地感谢你……是你的第二篇论文而不是我自己使我弄明白……你的论文绝妙地解开了我的迷雾。我

为此而感谢你，而且，每一个关怀科学福利和世界利益的人，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感谢你，如果说目前还不感谢的话。

你不要期待我对你的论文的评论，我在这方面只是个学徒。

谢林的论文给黑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黑格尔在信中推崇备至：“仅就我所理解的主要意思来说，我从你的论文中看到你在科学上为我们完成了卓著的成果——我从中看到一个为全德思想体系的重要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的人的作品，我以能与你交朋友为荣。”

在研究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时，黑格尔敏锐地觉察到了康德·费希特哲学中所渗透的反传统神学的人本主义精神，黑格尔在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中写道：“……我已经看出了实践理性的那些公得研究中新的前景。很多先生将对这样从自身必然产生的结论大吃一惊，人们仰望着把人抬举……”

黑格尔在重新着手研究康德哲学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新哲学的理解和新哲学前进的方向：究竟如何看待康德学说？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这个问题应用到上帝的观念上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康德的上帝学说和道德证明，是有神论还是淫神论？”

谢林愿意在一元论和淫神论的意义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795年1月5日的信中讽刺了运用道德证明去证明有神论的态度，他的话使他在伯尔尼的朋友为之目瞪口呆：“看到他们知道如何把道德证明拉来作准绳，乃是一种喜悦——一霎那间，跳出来一个救星——一个在天空的有个体人格的本体！”

黑格尔有鉴于这些话，回答说：“来信谈到他们知道利用道德证明让一个有个体人格的本体跳出来，这段话我不完全明白。你认为我们根本不能达到这一步吗？”

谢林的讽刺运用于那种把迷信实证宗教和迷信所谓自然宗教同康德的词句结合在一起的有神论。黑格尔以惊异和怀疑的口吻询问新哲学是否确实不立足于有神论，而谢林却相信新哲学急需否定有神论。

这种新近的康德哲学，突破了有神的界限，进展到了一元论；改变了上帝的观念，改变了对上帝的认识和宗教观点；可以这么说：新哲学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宗教纪元的开始，从新哲学中产生了看不见的教堂以及随之而应该来到这种教堂的上帝王国。

哲学变成了宗教。热情被唤醒了，连表面上非常冷静的黑格尔也激动了起来，他在1795年1月底给谢林的信中写道：“让我们经常重复你的口号吧：我们不落后。”“上帝王国来临了，我们加紧工作吧！”

“理性和自由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共同点仍然是看不见的教堂。”

黑格尔经常用《生命旅程》的诗句来鼓励自己：

朋友们，向太阳，
让人类的幸福之果快快成熟！
几茎残枝，几片碎叶，
怎能把太阳的光辉遮住？
要穿过这些残枝和碎叶，
奔向太阳边去，
吸吮着它的热和光，莫虑！
最好莫过于
让自己酣然永驻。

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否定人的理性，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系。黑格尔尖锐的指出：“宗教和政治是一丘之貉，宗教所教导的就是专制主义所向往的。这就是，蔑视人类，不让人类改善自己的处境，不使它凭自己的力量完成其自身。”

“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这种禀赋把他和一切大人物置于同一行列之中。”

我认为，人类自身像这样地被尊重就是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失了。哲学家们论证了这种尊严，人们学会感到这种尊严，并且把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夺回来，不是去祈求，而是把牢牢地夺到自己手里。”

随着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开始发生了一个有利的倒退运动，这个运动与恐怖政策背道而驰，它发展到使一个极不虔诚的党徒，以其作为革命之畸形产物在南特被杀，而著名的卡里耶尔于1794年12月16日被斩首。不久之后，黑格尔在他从瑞士写给谢林的第一封信中以满意的口气提到这个事件：“卡里耶尔上断头台，想已知悉。你们还读法国报纸吗？如果我记忆不错，听说法国报纸在符腾堡是被禁止的。此案甚为重要，它把罗伯斯庇尔的无耻行径全部揭露出来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黑格尔那种充满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在1796年12月回到了家乡，并结识妹妹的友人，天主教徒恩德尔，她在黑格尔家中作客数月，在以后的岁月中，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黑格尔57岁那年，还收到了恩德尔寄来的寿辰诗。

四 在法兰克福

黑格尔的好友荷尔德林在黑格尔呆在伯尔尼的期间，曾辞掉了家庭教师工作，漫游了几个地方，其中有耶拿。在耶拿他与席勒交往甚密，还以很大的热情听过费希特的讲课。他在致黑格尔的信中把费希特描写成为人类而战斗的太坦，认为他的影响所及的确不限于大学讲堂的范围之内。他还把费希特与学生教团的斗争告诉了朋友。黑格尔当时致谢林的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些印象多么深刻：“我为费希特惋惜，酗酒者和乡绅们竟如此反对他的精神力量。如果他放过他们的粗野而只决心挑出一群沉着的、特选的少数人，他实在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成效的。但是令人恼火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和席勒的态度一样，自信是个才足的哲学家。我的上帝，这中间还有一些如何咬文嚼字和奴才成性的人啊！”

荷尔德林辞去家庭教师职务，本打算在席勒和歌德身边专心从事写作，追随他的伟大的同乡（指席勒），但不是就这位同乡作为海盗，菲斯柯，阴谋与爱情以及顿·卡罗斯的作者而言，而是就他作为友谊颂，朱理亚与拉斐尔的通信，希腊诸神，以及艺术家的作者

而言。荷尔德林的心灵沉缅于对希腊世界的景慕与眷恋，他把希腊世界视为人类一度身历其境而又失去了的乐园。

因为贫困所迫，荷尔德林不得不于1795年底到法兰克福的一个银行家贡塔尔家里作家庭老师。1796年10月，荷尔德林推荐黑格尔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商人戈格尔家任家庭教师。黑格尔以能重返故园与至友重聚兴高采烈，他在回信中立即接受了这个不为重视的职位，回信是仓促写成的，连日期都不确切（1796年11月于伯尔尼城郊的楚格）。回信的语气表明黑格尔的心情是如何的欣喜。

能再次得知你的消息，的确令人高兴。来信的每字每句都流露着你对我的始终不渝的友谊。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这种喜悦，我多么希望很快能见到你和拥抱你啊！

就这样，黑格尔在1797年1月往北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旅途。

荷尔德林在贡塔尔家里作家庭教师，给四个孩子教书。贡塔尔对此一点都不关心，也不理解，没有什么兴趣，从不过问。贡塔尔很熟悉交易所的行情，夜晚总在俱乐部消磨时光。贡塔尔太太苏赛蒂是一位来

自汉堡的富家闺秀，很具有诗人气质。她比较关心，理解荷尔德林，时间久了，交往益发多了起来，贡塔尔太太的理解和关心也越来越热烈、越来越亲切了。贡塔尔太太有着罕见的、完美的、极富古典意味的姿色和灵魂。她的容貌和品质，使这位比她年轻，醉心于希腊和柏拉图极乐园的家庭教师——荷尔德林堕入了情网。他当时的密信充满了这种迷恋之情。笼罩在他俩之间的爱通过精神上的交往而日益得到培育和提高。荷尔林德热爱着她，并用伯拉图的对话《宴饮篇》中的女祭司迪奥蒂玛的名字来称呼他的情人，把自己的诗献给他。

荷尔德林当时心神极度不安定，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失了理性，甚至陷入了犯罪和堕落。这时荷尔德林很希望同至交黑格尔相聚在一起，因为他相信：“同黑格尔的交往是很令人愉快的，我很爱安静的、重理智的人，因为当我们不知道如何自处时，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给我们拿定方向。”

黑格尔到了法兰克福，和荷尔德林见面了，却不能长久相聚，荷尔德林所确实信赖的朋友黑格尔也无法指导他“拿定方向”，使他的诗人般的激情受到控制。荷尔德林和贡塔尔太太依然在相爱着。

俗语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更何况是爱情这把火？荷尔德林和贡塔尔太太之间的爱情被人察觉

出来了。一个心怀叵测的妇女将此事告诉了贡塔爾。贡塔爾原本性格就极为暴躁，还是孩子时就因愤怒挖掉了自己一只眼睛，一目失明，只能用另一只眼睛斜视。贡塔爾听到这件事，非常气愤，在1798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突然地侮辱了荷尔德林。荷尔德林那颗诗人般脆弱的心受不了这种无礼，极其痛苦，并立即永远离开了贡塔爾家，但他和贡塔爾太太之间的热恋和书信未曾中断。她是他诗里永远的迪奥蒂玛。

1802年，贡塔爾太太去世了。荷尔德林听到这个噩耗后，立即徒步赶往法兰克福，沿途风餐露宿，十分劳累，以致最后神经错乱。黑格尔和谢林对他们这位天才朋友的不幸深为同情，想尽办法，使他恢复。可是荷尔德林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在神智混乱中度过了生命的后36年。图宾根神学院的一颗文化巨星就这么陨落了。

荷尔德林的诗人气赞同是使他致死的主要原因。他把诗才都消磨在抒情诗里，消磨在缠绵、悲哀的情感里，他渴望死亡，在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要求进入仙境，
见到阿尔考斯和阿那克里安。
我安睡在一间小密室里，
马拉教的神明共鉴。

啊！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泪珠，
滴在神圣的希腊国王；
啊！帕尔翠（帕尔翠，希腊神话中司命运之女神），
让钳刀发出声响吧，
我的心已如死灰。

荷尔德林的遭遇使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原本愉快的经历变成了扫兴的，不幸的回忆了。他在给友人辛克莱的信中表达了这一心情：“为我们巍峨的菲尔德山和阿勒金致意，我从不幸的法兰克福经常很愉快地眺望它们，因为我知道你住在它们的山脚下。”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比在伯尔尼时间上稍显空闲些，他在这里同从前一样，关心政治、宗教和社会状况。还研究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摩西五经（犹太教圣经前五种，即基督教《圣经·旧约》），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德译本）。

1798年，黑格尔深深地被他故乡需要改革的直接现状中的问题所激动，他竟积极计划处理一张致同乡和“致符腾堡人民”的传单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和要求。传单的题目是：“符腾堡市参事会必须由人民选举”，或者是“来自市民”。最后的措辞是“关于符腾堡最近的内部情况，特别是关于市参事会的宪

法。”黑格尔在同斯图加特几位朋友通信商讨之后，不得不相信他的文章对于故乡的政治状况改变和改善没有起任何作用或作出贡献。

1797年终，符腾堡发生了一起王位更选的事件，1798年初，德意志帝国在拉斯塔特会议上把莱茵河左岸让与法国。

自从法国革命以来，人们的心灵就热烈盼望有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时代，渴望纯洁、自由而兴叹和不满现实的情绪到处都被激动起来。国家这座大厦的现状维持不下去了，而这种感觉是普遍而深刻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需要垮台？一切同人类道德、需要和意见不再协调的设置、宪法和法令，都失去了精神，它们都不能再存在下去；它们是不再能用美好的言词来粉饰的挖掘者。

每个人都感觉到改变是必然的，但是一遇到实际，大多数人就不安地注意他们的利益，而不愿意理解有关改革之事，除非这些改变同他们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他们拉平消费者，使其不得不限支，但是一遇到实际，就发现他们迄今的每项支出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人由于害怕国家大厦被颠覆的危险，被迫作些改变；另外一些人则出于正义的观念，超出自己的细小利益之上，而大胆地企求政治上的改革。

众所周知，攸关符腾堡的改革必须由邦议会议员

保证按照独立的，开明的和诚实的选举方式来发起。旧符堡宪法的组织使宪法“最终围绕一个人打圈，他预先把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而不保证承认人权和尊重人权”。

事实是，邦议会议员委员会及其他由委员会的官员掌握，委员会倒不专横跋扈，它只是懒散和漫不经心，不过也许在它背后有人为它说，为它写，也为它思想；至于委员会的官员，律师和法律顾问却是专横跋扈、自私自利、独断专行的。没有一个牧师对于他忏悔者的良心比这些政治上的长老对于委员会近亲们的官员良心有更大的权力。委员会偶尔也有心把忠直的人当法律顾问，他们的确能提携委员会，因为它不能独自迈步；不过他们决不会至少也不会有意地，经过考虑地把委员会引入泥坑。法律顾问可算作是邦议会议员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经常向候爵们泄露一些有益的情况。黑格尔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专横跋扈的，决非委员会本身，而是它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委员会只是懒散，它对于法律顾问和律师们的一切独断专行都漫不经心地允许引用自己的名义。就是这些人，他们引诱委员会允许宫廷大肆挥霍，而唯一可以与此相媲美的就是找些无聊的理由为这类投靠作辩护。就是这些人，宫廷方面也极力罗致他们，因为宫廷方面知道，只要把律师和法律顾问拉到自己的利益的一

边，就有把握达到目的。”

从这些片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目标是希望符腾堡有一个按现代精神改造了的代议制宪法，以限制世袭君主制，不准许它滥用权力。颇有趣味的是20年以后（1817年），当黑格尔写到他关于符腾堡宪法争论的公开评判时，他却站在君主一边，在那场争论中，邦议会议员是要求挽回旧符腾堡宪法的。真乃是“世事易改”、“此一时，彼一时”呀。

1799年1月14日夜，黑格尔的父亲安然去世，这消息对黑格尔来说非常惨痛。这已是他在法兰克福遭受的第二个打击了，好友的不幸遭遇，父亲的故去都给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时光笼罩了一层伤悲的色彩。黑格尔的父亲的遗产总计约10500古尔盾，黑格尔分得的遗产比他的弟妹所分得的遗产略少，约3000多古尔盾（昔时金币及银币的名称），虽然不算很多，但对登上大学讲坛之用还是绰绰有余的。由于有了经济上的准备，黑格尔打算离开法兰克福这个“伤心之地”，辞去家庭教师的工作，到一家大学里当老师，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创造条件。黑格尔考虑走上大学讲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学术上的原因。在这个时期，黑格尔在学术上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写了一些草稿，未来的哲学体系已在酝酿之中。为了跻身于学术界，黑格尔放弃了法兰克福

的待遇优厚的家庭教师工作。

当时德国哲学的中心地耶拿，德国的诗歌和戏剧艺术在魏玛。席勒已迁居魏玛（1799年）；费希特由于无神论的争辩以及因魏玛政府的斗争，已离开耶拿，迁居柏林，谢林当上了哲学副教授（1798年），他在班堡逗留了几个月以后又回到了耶拿（1800年10月）。歌德、赫尔德以及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兄弟也都住在耶拿。耶拿是当时德国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最活跃的大学城，名人云集，学术气氛浓厚。

出于个人的权衡，黑格尔决心去耶拿。在去耶拿之前，黑格尔希望能在另一个城市十分顺利地完成准备工作，地点可以是爱尔福特或爱森纳赫，也可以是他最喜爱的班堡，为的是在那里可以就近考察天主教。没有人能比谢林更好地帮助他，因为谢林刚刚在班堡滞留了几个月之久。

基于这种想法，黑格尔于1800年11月2日写信给谢林：

亲爱的谢林：

虽然我们已分别多年，但我想，您是不会因我一点琐事求助于您而嫌麻烦的。我希望您在班堡给我找一个住处，我想在那里住一个时期。由于我最终看

到我能够离开我至今所处的环境，所以我决定在独立的环境中过一段时间，以便从事于已经开始了研究和著作。在我确信有能力参加耶拿的学术角逐之前，我想预先在第三个地方好好地充实自己。

我想到班堡，因这我希望在那里和您相见。听说您要回耶拿，而我在班堡并不认识人……若是您能设法使我在学术上结识几个朋友的话，我将同样感到高兴。您了解各地的情况，也许别的地方，如爱尔福特，爱森纳赫更为合适些，那就请您提出建议来。我的要求是生活费用低廉，有对我身体有益的好啤酒和几个相识，其他并不计较。

但是，实际上黑格尔并未到任何第三个地方去，在1801年1月，他从法兰克福直接到了耶拿。

五 在耶拿

黑格尔于1801年1月来到耶拿，直到1807年3月才离开，这六年时间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富有意义、最艰难辛苦的岁月，同时也是黑格尔初露头脚的时期。

黑格尔在启程前写给谢林的信中说：“我不能满足于从人类低级需要的科学教育开始，我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也就是化为一个体系。现在我问我自己，我在什么时候才能着手这一工作，将怎样求得对人类生活的干预。”这一年，黑格尔已经整整30岁了，中国有句古语：三十而立。意谓人在30岁时其事业就应初具雏形，人的一生的方向和未来生活的轮廓也已基本确定。从这句话推断，黑格尔不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而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成功者。

黑格尔是带着自己的谦恭，怀着对谢林的敬意来到耶拿的。他在信中写道：“我以惊羨和愉快的心情注意你的人所共知的伟大步伐……我十分信赖你，我相信你认识我的无私和努力（即使这种努力的范围是微不足道的），并发现其中的价值，我盼望能见到你，

即使还很遥远，我知道你一定重视我的命运，相聚之日，尚望有以惠我。”

谢林自1798年起在耶拿大学当讲师。黑格尔到耶拿后，当年8月，得到谢林推荐。向耶拿大学提出拉丁文就职论文《论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经同意以临时提纲进行答辩。辩驳人有谢林、尼塔麦和施瓦塔特。答辩通过后，随即申请讲课资格，办理手续，得到讲课许可，成了耶拿大学的一个无俸教师。

古人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图宾根神学院的两颗文化巨星在经历了长久的分离之后，终于又走到一起来了。黑格尔和谢林又开始了他们同住一室的快乐时光。

把理想与现实或理性与自然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行星轨道的规律，是黑格尔就职论文的基本思想，黑格尔通过援引德国伟大天文学家约翰·开普勒所发现的三大天文定律和天文学家波德·提丢斯所提出的算术级数，在1801年8月27日答辩中，主张火星与木星之间找不到行星，可是这时，巴勒摩的皮亚齐已于1801年元月1日在火星与木星之间发现了谷神星！

关于这件事，现在反对哲学特别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的人都无休止地拿它当作笑话，尤其是那些从黑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中没有了解到任何东西的人，以及

道听途说，除了知道黑格尔的这个错误就几乎不知道其他的人，更是如此。黑格尔不知道几个月以前皮亚齐在巴勒摩已经发现谷神星，这是可以责难的，如果人们愿意把这叫做责难的话。此外，这颗被发现的星星并不是行星，而是一个类似行星的物体，是一颗“小行星”，就象本世纪内人们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了近四百颗小行星一样。黑格尔认为：使苹果落地的力和使行星环绕太阳运行的力，并不像牛顿所说的那样是同一种力。他在这篇文章中诙谐地提到：“苹果在世界上曾招致许多灾难，具体说，有三种：夏娃的苹果，巴利斯的苹果，最后就是牛顿见到的从树上掉下的苹果，万有引力学说就是在这一见解之下产生的。人们翻烂了的历史小故事就是这样说的。人类的堕落归咎于第一个苹果，特洛亚的毁灭归咎于第二个苹果，天文学的灾难归咎于第三个苹果。哲学需要当心苹果，它是一个不祥之兆。”

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苏格拉底使哲学从考察天上下凡到地上，以便认识和细察人也；而今又回到了哲学回升到天上的时刻，为的是在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之后重新考察行星的轨道，认识它们的规律，从而说明理性与自然的同一性。

图宾根神学院的三颗文化巨星中，谢林最早显露出他非凡的才华。在比他大五岁的黑格尔还是一个默

默默无闻的学者的时候，谢林已经开始在哲学界显露头脚，“小荷才露尖尖角”。黑格尔迁居耶拿之时，谢林已离开康德、费希特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并且很快成了新思潮的领袖。谢林的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演说以及浩繁的著述使他一时间成了青年人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谢林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他所谈吐的思想触动了我以往未曾被触动的心弦，在那虽然不大，但十分拥挤的教室里，他站在讲台上，讲得极其优雅流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一切听众都聚精会神，鸦雀无声；这个人确实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年轻气盛的谢林，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进步思想家。他不承认任何权威的传统，主张一切事物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上，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他推崇自由的人格，人的权利以及文明和进步，要求改造科学、哲学、宗教和教育，即改造人类的生活。他在给黑格尔的一封信中说到：“只要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人团结一致，在各个方面协同工作，从不同角度为同一事业奋斗，沿着不同道路奔向同一个目标，那就一定会夺取胜利。在我们这个僧侣和文士的同度里，一切对我多么狭隘啊！如果我一旦能自由地呼吸，我该多么高兴啊！”

恩格斯曾评论青年谢林的思想，说他像一条插着

飘扬的旗帜、全速在大海中航行的船，迎着风浪勇猛前进。

黑格尔虽然比谢林年长，但他仍像在图宾根神学院时信服老师一样信服谢林。黑格尔对老朋友的成就感到高兴，并完全接受了谢林的学说。黑格尔以前是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的追随者，现在又成了谢林哲学的追随者。黑格尔在一封信中对谢林说：“你的榜样和勤奋不断鼓舞着我，为塑造我们的时代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1801年，黑格尔担任了耶拿大学哲学讲师。在授课资格答辩会上，黑格尔致词说：“我请求您，世上最聪明的、最可尊敬的谢林教授先生，把我们提纲中您所不同意的一切论点在这里公开指出来，因为这次答辩就是为了向您请教。不言而喻，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使我感到多么荣幸。不是同时代人，也不是朋友，唯独后代，唯独科学（因为它是永恒的）才配评价您的精神的高贵力量，评价您的精神能力。请允许我推崇您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正如黑格尔在1801年12月致一位法兰克福友人信中所嘲讽的那样，为了对非哲学加以痛击，他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棍棒、鞭子和木剑”。当时，莱因哈特在一篇论文中认为谢林哲学不过是费希特知识学的后继和旁枝，一点都不了解谢林哲学的新

颖和创造性。为此，黑格尔1801年7月撰写了耶拿时期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费希特哲学体系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这一篇论文开始以书本形式出版于耶拿大学书店，后来又发表于黑格尔和谢林共同举办的《哲学评论》杂志上。

《论费希物哲学体系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文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批评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公开为谢林哲学辩护。黑格尔指出：费希特诚然奠定了同一哲学的基础，并坚守它的原则，但无论如何并没有完成它，结束它；这是由谢林通过他的自然哲学：先验唯心论以及他对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说明来实现的。因此，谢林应当被看作是绝对同一性体系的真正代表，是当前最伟大的哲学家。

自我 = 一切，这是费希特哲学的主题。但是，自我 = 一切这条同一性原则，理所当然的要求用一切（因而也就是非我，亦即自然和世界）= 自我来补充。而这一点，费希特既没有做到，也不能做到；他提出了要求，但未实现。费希特的体系始于自我 = 自我的原则，终于自我应该等于自我的原则。

费希特哲学的原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是主体 - - 客体，但只是主观的，谢林哲学的原则也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也是主体 - - 客体，但它是客观的，或者勿宁说，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它是二者的

结合。莱因哈特不能认识这个区别。黑格尔指出：“他的论文不仅忽视了费希特体系之成为不合法的幻想从而也就成为不合法的哲学这一方面，而且忽视了谢林体系之不同于费希特体系的方面，忽视了谢林在自然哲学中把客观的主体——客体同主观的主体——客体对立起来，并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使二者结合成为主体。”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黑格尔不同意谢林的绝对的同—。他认为，主客体的同—是在绝对中包含差别及其展开过程的同—，谢林的“绝对”取消了任何差别和对立。

一般地说，这篇论文已经为黑格尔未来学说的鉴定者积存了黑格尔思想的那种需要发展和可以发展的萌芽。当然，它在语言上还非常缺乏读者所必需的适当的清晰性和鲜明性；文采之抽象、呆滞和不明确，使人感到困难和不足，这就很自然地招致人们抱怨黑格尔文笔的晦涩难解。

黑格尔来到耶拿开始学院生活三年，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签订了鲁涅维尔和约，第二次同盟战争就以这个和约而告结束，有千年历史的德意志民族罗马帝国的终结（801—1801）也以这个和约而确定下来；莱茵河不再是德意志的河流，只不过是它的边界。黑格尔从内心感到有责任说明德

国衰败的原因和复兴的方法。他于1801年到1803年之间起草，撰写了《德国宪法》一文。

国家的沦落就在眼前，只不过它的最后命运尚未应验。论文落后于德国所突然遭遇命运的进程，文中仅提到鲁涅维尔和约，并未提到拿破仑保护下的莱茵联盟的建立和罗马皇帝法兰茨二世退位（1806年7月和8月），这似乎可以看作是这篇论文没有发表的原因。

德国的命运就其分散和割据来看，可与意大利相比，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可与马基雅弗利的观点相比。马基雅弗利有志于统一意大利，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期望有一个在政治方面和战争方面精明强干的君主；黑格尔必然充分评价马基雅弗利的重要性和他的伟大精神，他发现腓特烈大帝在反对马基雅弗利时，诚然是反对和否定了这位意大利政治家的原则，但在战争的政治方面，腓特烈大帝实际上却遵循了这位政治家的原则。

德国的根本腐败是没有战斗力，缺乏行动的活力或能力；不过这些弊端的原因决不在于民族性，而仅仅在于它的宪法的状况，在于整个机构。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东西，它的活动都不是按合法方式进行的。德国的政治情况是一种合乎宪法的无法律限制的状态，因此，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很中肯地谈到德国，说它是

一个“制定了宪法的无政府状态”。

德国由于它的宪法而被冷落地宣判为缺乏行动，因为它已经麻痹了，无力使思想付诸行动，而这种麻痹是合乎宪法地造成的。因此，黑格尔把德国称为“只能思想的国家”。他绝妙的描述了这种麻痹的状态。

全国性的指令制定以后，原是应该执行的，而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要由法庭来处理。如果这种拒绝不是合法地作出的，那就仍然不能执行；如果这种拒绝是合法的，就能阻止宣判，但即使宣判了，也不会被服从。不过这种判决的意愿是应该执行的，并且应该以刑罚，于是下命令强制执行；然此种命令之不行如旧，于是又下一道判决强制执行；可是这个判决又未被服从，于是又继之以处分，百此处分之不行依旧，如此等等。这就是本来应该使法令生效的环节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变成单纯意愿的无聊过程。

国家的健全在战争动荡时期比在和平时期更能表现出来，因为在战争时期会出现一切个体与整体相联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取决于国家能够向它们提出多少要求，它们出于自愿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能用到多大程度。

在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德国自己已经看到它不复成为一个国家，看到它的政治情况无论在战争

本身中还是在和平中，其内部已变成什么样子，这种和平虽然结束了战争，但其明显的结果是：损失了一些美丽的国土和几百万居民，债务的重担压在南边比在北边压得更重，它使战祸进一步延续到平时期；除了征服者以及同时来的异国法令和风纪的统治外，许多国家都丧失了它们的最高的善，都不成为自己的国家。

德国已经丧失了这种最高的善，“它不复成为一个国家”。它的合乎宪法的无法律的限制状态，它之缺乏一切有力的中央集权，它的“无政府状态”和“无财政状态”，都应归罪于它迄今的宪法。复兴德意志帝国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力上和财力上都有一个合乎宪法的集权。

黑格尔这篇关于德国宪法的论文，其目标首先在于使德国人在意识上有一个进步。他想使一般人清楚地意识到德意志帝国当前是个什么样了，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正确认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正确认识我们现在有什么和我们是如何，正确认识我们已经阅历到的东西，乃是一个新的美好时代所必不可少的开端。黑格尔后来说过：“这篇论文所包含的思想，其所以公开发表，并没有别的目的与作用，无非是想促进对现实的了解，使人深入这篇文章的实际论述和尚可接受的言辞之中，得到较为冷静的见解。”

1801年冬季，黑格尔协助谢林创办《哲学评论》杂志。在刊物上发表他们的共同的哲学观点，痛斥所谓“非哲学观点”。

早在1798年柯达在莱比锡就曾委托谢林办杂志。“狂飙运动”的瞬息变化，哲学思潮频繁更迭，耶拿，魏玛宗教文学思想斗争曲折多变，谢林这时以其自然哲学风头正健，就接受了委托，拉上黑格尔开始创办《哲学评论》杂志。

黑格尔当时名不见经传，以至进耶拿大学，有的人随意就能给他设上障碍刁难，后来知道他的，也不过当他是谢林学派的逻辑教师。据说，杂志问世后，雅可比通知布特维克说是克彭告诉他，有一种新杂志刚出第一期，是谢林和一位什么黑格尔先生编的。我还不知道此人是谁，不知道的人固然不知道，学校里倒有人知道他们这一批斯瓦比帮。不知道他们后生可畏，于是有老教授祖科头夫看他，叫他“这位先生”，后来才改口为“图宾根的硕士先生”。

《哲学评论》杂志实系同人刊物，全部文章均为黑格尔和谢林所写，但是都不著名。有的文章彼此修改过，有的文章后来难分彼此。从1802年1月到1803年5月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出版了两卷六期，每期印1000册。整个编务，黑格尔几乎全力以赴，谢林则逐渐脱离以至撒手不管。

康德的理性批判发表之后，20年过去了。谢林和黑格尔于1801年创办《哲学评论》杂志，目的是为他们的哲学开辟道路。

康德著作所产生的强有力的，无与伦比的鼓舞使精神受到最广泛的激动，这种鼓舞特别提高了哲学兴趣，唤醒了真正的和自以为是的哲学爱好与才能，在群众中兴起了哲学研究和哲学体系，传播了哲学的种子。

在伟大的诗人掌握了语言之后，诗就变成了廉价品了。“只要你能用一种适合你的创作和思想的有修养的语言作诗，你就以为你是诗人吗？”在伟大的思想家提高了理智的教化之后，思想观念就变成了廉价品了；现在很多人都在从事思想方面的事务，他们同哲学家的关系和诗作者同诗人的关系是一样的。当哲学作品在书市上竞卖和初次喝价时，足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没有给读者指出这哲学货色究竟有无价值，并从而教读者学会分辨黄金和黄色云母，那么，读者就会陷入混乱和错误。而这种指教就是哲学批判的使命。因此，黑格尔以《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一文开始他的杂志活动。

由于谈论哲学已成为时髦，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半哲学作品和完全非哲学作品；由于谈论哲学轻而易举，每个业余爱好者都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

此，只要每个有优秀哲学才能的人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完成哲学的理论时，人们就觉得当代的德国可以与希腊的哲学状况相比。但是，繁多和多样性并不等于硕果丰实，天才的创造性不同于冒充为创造性的特殊性。

“这种创造性倾向和追求自己的形式与体系的各种努力汇合在一起，这并不表示出现了希腊哲学园地里各种活生生和形态自由生长的景象，而是产生了许多可恶的痛苦景象，这些恶徒则是永远同浅薄联系在一起，或则是抓住一个又一个，崇拜一切，然后又相继加以摈弃。”在这种崇拜一切又摈弃一切的“恶徒”里面，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莱因哈特。

威廉·特劳歌特·克鲁格任当时符腾堡哲学院的助教，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在他的《论知识学通信》、《论最新唯心论》以及《哲学新工具草稿》中反对费希特和谢林所阐发的先验唯心论。克鲁格认为健康的人类理智有权反对意义深长的先验哲学，他以空虚的、自大的、令人讨厌的姿态想使这种权力发生作用，他所用的方式和方法在黑格尔看来乃是非哲学反对哲学的一个特例；黑格尔因而写了《普通人类理智如何理解哲学——对克鲁格先生的著作的分析》一文。

克鲁格把他的哲学观点叫做“先验综合论”，全文语调粗率，他以一种既非希腊又非拉丁亦非法兰西的方式，把一些名词打上哲学倾向和哲学概念的标记。

克鲁格的文章中有无数意识的事实是零散的，没有秩序和统一性的，正如黑格尔的讽刺诗所说：“一切都杂乱无章，就像鼠类和芜荑一样。”

为了把先验哲学家推到荒谬的地步，克鲁格竟然要谢林推演出克鲁格的钢笔，好像他的这支钢笔也是理智的必然行为一样，因为它决不应该是理智的偶然工具呀！黑格尔指出，克鲁格作为样子招卖的钢笔在本性上是可笑的。

事实在意识之内，而意识（不等于自我，而是）在自我之内，自我好似一个大容器，它包容一切可能的东西于自身之内。这就是克鲁格的折衷的特性，它同普通的人类理智携手并进。黑格尔说：“至此，克鲁格先生的综合论可以照下面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试设想一个克鲁格，他里面包含有莱因哈特的水，康德的走了味的啤酒，澄清了的溶液，所谓的柏林主义以及其他的类似的偶然成份等事实，克鲁格就是它们的综合物 = 自我；不过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某物，它赋予这堆杂乱的東西以统一性，它给这些东西分类，逐一地嗅一嗅，尝一尝，而首要地是听一听，然后加以讲述；这就是形式的统一性或哲学意识。”

克鲁格则说：“只要我正确的把握了我的意识事实，并表述得明白易懂，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否认我所提出的原则，甚至怀疑论者也不得

不加以承认。”

这时还出现一个怀疑论者——歌·恩·舒尔茨，他打着老怀疑论者艾因西摩德谟斯的旗号，攻击康德和莱因哈特的物自体学说。

1802年，舒尔茨以其包罗万象的作品《理论哲学之批判》出场。在这部著作中，舒尔茨提出：假如的确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那么，人类理性的这种无能必然是基于一种先天的缺点，这种先天的缺点在于我们不能越过我们的意识，不能认识隐藏在意识中的事物，因而也就是不可能认识物自身。我们面临普通经验或普通实在的领域，我们又揣想在这个领域背后还有一个物自身，它“像一条同样普通的实在性的山脉，肩负着那另外的‘实在性’”。

“舒尔茨先生除了把理性的东西，自在的东西设想为雪下的岩石之外，完全不能把它设想成为别的什么。”“用粗糙的方式去理解理性的东西和玄思，是不行的。”黑格尔在后面一节中说道：“他只能把康德哲学理解成最粗陋的独断论，认为它具有一个现象和现象背后的事物自身，这事物自身就像现象的丛林背后不可驯服的动物一样。”

黑格尔认为，新近怀疑论（指艾因西德谟斯和舒尔茨的怀疑论）和古典怀疑论（指皮浪的怀疑论）相比，区别是明显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私生子，没

有后者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高贵特色。它是独断论，而且是最低级的独断论。

黑格尔还认为，舒尔茨与克鲁格携手并进，怀疑论与普通的人类理智完全一致。

“独断论与怀疑论同居一室，亲如兄弟。舒尔茨的怀疑论和粗糙的独断论结合在一起，克鲁格的独断论同时包含那种怀疑论于自身。”“认为意识的事实具有不可否认的确定性和真理，这种蛮横的观点，既不是早期的怀疑论，也不是某种唯物论所应负其咎的，只要这种唯物论不是完全野蛮的话；一直到最近，这种蛮横在哲学上是闻所未闻的。”

黑格尔到耶拿的第一年（1801年）10月21日，他第一次见到了歌德，这两位人类思想史、文化史著名的巨匠自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歌德自1795年任魏玛公国枢密院大臣，对于耶拿大学的改革着眼于整个公国学术文化的繁荣，颇费心思，筹划经营。费希特的来去，谢林的聘请，黑格尔的安顿，他都很关心，尽管他最热心的还是文学事业，戏剧诗歌活动。歌德和黑格尔的友谊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黑格尔去世。

1805年，黑格尔得知他在耶拿大学的对头弗里斯已内定晋升为副教授时，立即愤而奔走吁吁，得到歌德的大力推荐，最后幸而如愿以偿，于3月晋升

为耶拿大学副教授。

1806年6月，得到歌德打通关节，从魏玛得到100塔拉的年俸。这笔年俸诚然很微薄（当时大学生一年生活费尚需200塔拉），但是魏玛所辖土地面积小，国库枯竭，战争在即，而且公爵特别不容易批准新的支付。歌德在1806年6月27日给黑格尔的信中写道：“收入虽然不多。但你可以把这笔薪俸看作是一个证据，说明我一直不断地，沉着地为你尽力。我的确希望能通知你得到更多一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开了一个头，将来也就好办了。”

讲台上的黑格尔远不及费希特和谢林那样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是像坐在家里书桌前一样，翻翻自己的笔记本，找找要讲的段落，吸吸鼻烟，又打喷嚏，又咳嗽。他低沉地讲着，费劲地斟酌字眼，并不考虑如何讲得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人们管他叫“木头人黑格尔”。第一期只有11名学生报名听黑格尔的课，就是到了后来，耶拿大学听黑格尔讲课的学生，也难得超过30名。

黑格尔还经常陷于沉思，以致有时闹出笑话。有一次上课，他心不在焉地提前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的课，他两点就去了。讲堂里听课的是另一批人，可是他没有觉察到，就在讲坛下坐下，讲起课业。有个

学生向他暗示搞错了，他压根儿没有理会。按照课程表，这时应该由奥古斯蒂教授来上课。他来到教室门口，听到黑格尔的声音，以为自己迟到了一个小时，于是赶紧退了回去。到了3点钟，黑格尔的学生们都来了，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就好奇地等待着，看看他们的老师如何摆脱这个尴尬局面。黑格尔说：“诸位，感官可靠性究竟是否真正可靠，首先取决于自身的意识经验。我们一直认为感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小时以前却对此有了一个次特别的经验。”说完，嘴角间浮起一丝微笑，便又接着讲课了。

在耶拿大学发生了一件对谢林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他与卡罗列娜的爱情。卡罗列娜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还有着传奇般的坎坷经历。1796年她与浪漫派作家威·施莱格尔结婚。当谢林初到莱比锡结识施莱格尔兄弟时，卡罗列娜就对谢林产生了好感。谢林到耶拿大学任教后，她与谢林交往密切。卡罗列娜把自己的女儿鲍莱尔许配给谢林。不幸鲍莱尔因病夭折，谢林十分痛苦，本想就此断绝他与卡罗列娜的关系，没想到她却毫无保留地向他倾吐了自己的爱情，而与威·施莱格尔的婚姻也日益失去意义。几经周折，1803年3月她终于在歌德的帮助下解除了与施莱格尔的婚约，并与比她小12岁的谢林结婚，婚礼是由谢林的父亲主持

的。

谢林与卡罗列娜的婚姻对他的哲学活动有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史家费舍尔指出：“卡罗列娜的情感对谢林精神的蓬勃发展比世界上任何赞助都更有推动作用。”当代民主德国哲学家布尔也说道：“谢林与卡罗列娜的结合是一个崇高的范例，表明一位天生感情丰富，才智出众的女人的爱情会如何鼓舞与提高男子的创造；在1809年卡罗列娜去世以后，我们则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创造性在日益衰退。”

然而，这段罗曼史在耶拿引起不少流言蜚语。谢林觉得还是离开这里为好，遂与新婚妻子离开了耶拿。

谢林虽然离开了耶拿，离开了好朋友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的著作仍抱有很大的期望。1807年1月11日，谢林写道：“我翘首以待，你最终能发表你的著作，如果你时间充裕，成果一定会成熟起来的！但愿你有更安静的时间和闲暇缕述你的厚实的、也可以说是不朽的著作。”

谢林的离去，席勒和歌德益发关心黑格尔的状况。1803年11月，席勒函告歌德：“哲学并未沉寂，黑格尔博士博得了许多听众。”很显然，这是因为谢林的“余荫”，一些学生很自然的转到黑格尔的班上来。

黑格尔在1806年9月17日致尼塔默的信中

惟恐战争有爆发之势，“希望上帝与我们同在”；然而，拿破仑在班堡接到了普鲁士的最后通牒（10月7日），并在他的军队中公布了战争宣言，黑格尔对“柔和的十月”能吹来的和平的微风希望落空了。眼前的一切按拿破仑的方式亦即闪电式地进行。战争爆发了。

普法战争期间，黑格尔和歌德一样认为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继承者，是个革新家，他将摧毁旧的秩序，并为法国开辟新的道路。黑格尔热烈欢迎把《拿破仑法典》介绍到莱茵联盟各国来，他认为拿破仑的政策将促进德国的民族复兴。

1806年10月13日清晨，法军占领了当时黑格尔居住的耶拿。30日拿破仑皇帝进入耶拿。黑格尔不顾个人的得失，不抱民族偏见，而是以十分敬慕的心情描绘这位征服者。就在这一天晚上，黑格尔在给尼塔默的信中写道：

我见到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着马出来在全城巡察。看到这样一个个体，他掌握着世界，主宰着世界，却在眼前集中于一点，踞于马上，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从星期四到星期一，只有这个使人不能不五体投

地的杰出人物，才能采取这样一些出乎意料的步骤。

夜 2 3 时，黑格尔从他的寓所注视着法国兵营的火焰笼罩了整个市场，注视着他的理象学后稿的最后部分。

黑格尔非常景仰拿破仑，但是这位“世界精神”的士兵们并不客气，他们将黑格尔的钱财洗劫一空，使黑格尔流离失所，不得不寄居在一位朋友那里。

10月18日歌德致耶拿诸友人的一份传单，打听他们的近况和他们在战争的日子里遭受到了什么损失。其中一个姓名、地址就是写的“送旧剑术馆黑格尔教授”。黑格尔因战乱一时困顿无依，急需用钱，歌德托付克涅柏尔送来了十塔拉，解了燃眉之急。黑格尔在给克涅柏尔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把《圣经》上一节话做了我领路的明星，它的真理是我从经验中体会得到的，‘先把衣食弄到手，天国的门才能在你死后为你开启’。”

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曾经是谢林哲学的追随者，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谢林哲学那里，而是要着手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在耶拿被法军占领的前夕基本上完稿。黑格尔在逃难时尚带着《精神现象学》手稿的最后部分。他借着营地和炉灶的火光，把幸免

于难的手稿整理出来，并写完了最后几页。黑格尔后来功成业就，想到自己在一场大战前夜写完《精神现象学》一书，常为此感到自豪。

《精神现象学》应由班堡的书商戈布哈特承印和发行，但黑格尔没有遵循康德的聪明原则，等原著从头到尾都写好誉请以后才开始印刷。这部著作尚未写完时，就已付印。每印张稿酬18古尔盾，全部交稿以后，稿酬的头一半就该到期。对于一部正在执笔过程中的著作，要确定哪是头一半，那是很困难的。

1806年2月，这部著作开始付印。9月，黑格尔亟需稿酬，可是发行人拒绝一切支付，一直到全部稿件到手为止。黑格尔对发行人不信任，而发行人同时又是书商和印书人，黑格尔遂求助于班堡的友人尼塔默。尼塔默于1806年9月29日订约：假如一直到10月18日还不能全部交稿，就负责把整个已排印的版买下来，每份偿付12古尔盾。这样发行人才支付了应付稿酬的一半。尼塔默以他这样的保证向耶拿的友人表现了真正友谊之举，黑格尔称之为“英雄气概”，他现在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自己的义务，一直到10月18日！

10月6日星期一，黑格尔这样写道：“最要紧的是寄出全部稿件，此事应于本周内完成不误。”

10月8日，他寄出了一半，另一半应于10日星期

五续寄。“我只有向你描述了我为此事烦恼到什么程度，才能全部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如果此稿的一部分遗失，那我也无可奈何，我很难再修复，这部著作也就完全不可能在今年出版。”

人说，患难见真情；雪中送炭；英语中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朋友就是下雨天，给你打伞的那个人，所有的这些诸如此类的谚语、成语，都不足以描绘尼塔默对朋友的真诚相助，人生一世，交此一友，足矣，无憾矣！

虽然不无周折，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于1807年3月出版了。这本书表明黑格尔哲学已不再是谢林哲学的一个支派，一种注释，而将是一个真正体现了理性和自由时代思想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曾把《精神现象学》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此书序言指出：这篇著名的长序……表示出他与原先志同道合的谢林的主要分歧。序言中批判的公式（ $A = A$ ）是谢林1801年《释我的哲学体系》中提出来的。黑格尔还批判了谢林由思想空虚而带来的形式主义，批判形式等于本质，笑“黑夜观牛，凡中皆黑”，这些批判尽管是不指名的，但莫不针对谢林。不过，黑格尔在信中则委婉地向谢林说序言上是

批“那种把您的公式变为胡批，使您的理论化成干瘪形式主义的思想空虚”，并申辩谢林对这种思想空虚的评论找不到做得过分的地方。以此缓和谢林的情绪。

但是，当谢林收阅了这部著作——他仅仅读了序言——以后，过了半年才回复黑格尔。在谢林看来，这篇序言实际上是一篇独立宣言、造反声明，对黑格尔在序言中的评判心情愤懑。1807年11月2日，谢林给黑格尔写了一封礼貌而冷淡的信，信的结尾写道：“但愿还值得继续做您的真正朋友。”

两人的信札往来以这封信而告终。在实际上，这两个青年时代要在共同道路上携手并进的密友，就此反目相向，各行其事了。

继谢林离开学校，尼塔默、神学教授保卢斯、法学教授胡夫兰德也步其后尘，先后去了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1804年，卡斯特纳到海德堡大学教化学去了。

黑格尔在耶拿的社交圈骤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仍有些熟悉的同事留下来不时地环绕着歌德这个中心，毕竟不成气候了。1805年席勒去世，歌德受到很大刺激。耶拿大学盛极一时的往昔真正逝去了。耶拿被法军占领之后，整个大学就陷于不振，陷于深深的、长期的衰微之中。

不幸的大战之后，黑格尔不得不考虑改变他的生

活状况。他的一点资产早已耗尽，写作、讲课和薪俸的收入也太微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大学正在衰退，光顾的人数渐渐减少，城乡饱遭战祸。软弱无能、四分五裂、受战争公债压榨的普鲁士处于梯尔西特和约之下，与此相反，同拿破仑结盟的莱茵联盟诸邦，如巴威略、符腾堡、萨克林以及新的选帝侯国巴登，则繁荣昌盛。

还在战前，黑格尔就想到巴登任海德堡大学教授之职，这时就函约福斯（诗人，著名的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家）。福斯曾于1802年至1805年住在耶拿，后应聘到海德堡。黑格尔在1805年5月的信中夸赞福斯，并表明自己的志向：“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如果你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成为过去，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也就永远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

福斯接到信后随即同管理巴登大学事务的政府官员福·莱采恩斯坦因商谈，这位官员惋惜地解释说，大学财力拮据，看来，担任哲学教授的事已经告吹。

福斯在写信中提到：“祝愿您决心使哲学从云雾

的朦胧中重新同一切能说话的人作友好的交往！在我看来，不用亲切的衷心的语言，就绝不可能有真切的了解；我们丰富的，原始语言可以表达精神的任何自由活动和细微的活动。奥林匹克山上的神以牧师形态出现比超人现象能作出更大的奇迹。”

六 在班堡

正当黑格尔在耶拿为前途和生计发愁之时，他忠实的朋友尼塔默又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尼塔默始终乐于助人，这次又为黑格尔从事一种有益的，并非不如人愿的新闻活动找到了门路，这就是班堡日报的编辑工作。这份报纸是私人财产，处于地方行政机关监督之下，是一个法国侨民编辑的，此人已由沃斯特交军收容。后来又落到托依柏教授笨拙的手里，他不是吸引而是吓退了订户。枢密顾问巴亚尔德推荐尼塔默本人当编辑，尼塔默是地方管理会咨议，公务冗繁，只好谢绝，于是介绍黑格尔。巴西尔德是一个头脑清楚，精明强干的人物，立即同意此事，他很快排除了障碍，自任编辑，一直到黑格尔能离开耶拿。

黑格尔到任以前，尼塔默去慕尼黑当中央学校委员的教育委员会委员，他的影响所及大为扩张，以致伸展到整个新的巴威略王国。黑格尔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信徒的言语写道：“先生，如果你到了你的王国，请想念着我，我愿意祈祷！”

1807年3月，得到尼塔默介绍，离开耶拿，前往班堡，担任《班堡日报》编辑。

这个职务，收入并不丰厚，每年460福科林，但重要的是黑格尔曾对克涅柏尔讲过：“您知道，我一向偏爱政治。”在1807年2月20日致尼塔默的信中谈道：“对这一工作本身，我是很有兴趣的。您知道，我以何等的好奇心关注着世界事态的发展，我在这方面，以前也许是害怕它们，回避它们。我但愿看到，很快在这里面自己也有一份。在这样一份报纸里，我能够唱个什么调子，扮演什么角色，这要依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人们总是以为，我们的报纸几乎全都不如法国报纸。如若一份报纸既能和法国报纸相接近，又不失去大多数德国人所需的特点，即要有一些书卷气和报导上没有偏私，那将是很有趣的事情。”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黑格尔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他觉得办报纸可以使他参与政治，发挥舆论工作的威力。他雄心勃勃，想把《班堡日报》办成一个既具有法国特色又不失德国人口味的报纸。

歌德很是关心黑格尔的学说著述，听说黑格尔已撰写了《精神现象学》，很想尽早一读，了解黑格尔的思想方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于1807年3月正式出版。黑格尔首批赠送给了歌德、尼塔默、魏玛教育大臣福格特等。谢林于2月就从慕尼黑函卖，可惜这头一批赠书，黑格尔没把他包括在内，直到过

了5月才寄去一本。

歌德读后对黑格尔的拙于言词深为惋惜。11月，黑格尔接到谢林从慕尼黑寄来一份讲稿。论造型艺术和自然的关系，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已收到《精神现象学》，但是还没时间读，只翻过序言。后来知道，谢林认为黑格尔剽窃了他的观点而又叙述不当。

由于班堡已被法军占领，办报受到很大限制，没有写社论的自由，还有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很快黑格尔的万丈雄心就被消磨殆尽了。

1808年7月，《班堡日报》上发表了一则巴伐利亚部队调动的消息。虽然是转载其他报纸的，仍然招致已伐利亚慕尼黑官方追究，引起法律纠纷。这类事已招致外地《埃尔圭根报》遭查封。如今，事情还要涉及和法国占领的关系，黑格尔感到穷于对付，萌发了放弃记者生涯的念头。

在班堡，黑格尔从事了21个月的编辑工作，其中有一篇著名的短文《谁在抽象地思维》，这篇短文轻松而风趣，涉及辩证思维。

黑格尔时时关注着朋友们的近况，通信频繁，获取了各种信息。1808年10月，听说拿破仑会见歌德、维蓝（诗人），即致函耶拿的克涅柏尔：“我向你们打听这些，并非是为了报纸，而是为了增长自己的见识……”

七 在纽伦堡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肌肤，劳其筋骨……

黑格尔在班堡已呆不下去了，无奈他只好再次向尼塔默求助。尼塔默这时已任巴伐利亚中央学校及高级教会事务所顾问，经他介绍，黑格尔于1808年11月转往自由直辖市纽伦堡，到新由四所学校合并成立的麦南希特文科中学任校长。

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塔默，他出身于拜尔斯太因家庭，出生于符腾堡的斯图加特，是黑格尔的同乡。他在黑格尔的朋友中也许是最忠诚，最经过考验和最乐于助人的一位。

尼塔默在耶拿大学当副教授时，曾与费希特合办《哲学杂志》（1795年—1797年），杂志上发表的那篇福尔贝格——费希特写的文章，曾因为无神论的缘故引起指控和追究。尼塔默在事情的实质方面，在为此文的剖白和法庭的辩护方面，完全同意费希特，不过不同意他用那种方式和方法在判决面前威胁魏玛政府，以致可以说牵强附会地遭到惩戒和辞退。

尼塔默很镇静地忍受着善意的警告，保卫着他的

讲课自由，使其不受损害，就这样，这位由于无神论而被指控，被追究的哲学教授以后还能在这所大学当神学教授和讲道的神学的领导人。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大学的经历中几乎是还没有过。现在，尼塔默又于1807年春受召到新王国首邑慕尼黑当“中央学校委员”和“教育委员会委员”（高级督学）。他同神学家兼教会法院成员杜德尔来因的孀妇过着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黑格尔同她有着极为友好的交往，还同她通信，经常念到她，往往乐于称她为“尊夫人”。

黑格尔在麦南希特中学任校长期间，还教哲学，平时给缺课的教员代课，教古曲文学、高等数学等课。对学校教育，他强调学习古代语言和文学，认为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摇篮。这一点他受好友荷尔德林的影响很深。

1813年12月，黑格尔又被政府任命为纽伦堡市学校事务委员会督导。收入有所增加，手头这才觉得不再那么拮据。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随着其著作《精神现象学》的出版、发行，在社会上日益为人们所熟知，其影响也日益扩大。

1810年4月，黑格尔接到温迪施曼函称：“研究了你的科学体系，我确信，尊著一为人所理解，那必是人的解放的启蒙读物，这就象莱辛所想的，有

打开新福音的钥匙。”

耶拿大学哲学系编外讲师，黑格尔在耶拿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已赫曼写了《黑格尔的科学的体系》，推崇《精神现象学》在哲学上、人类文化发展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把谢林和黑格尔比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有趣的是，五年前（1804年），温迪施曼曾把所译《蒂迈欧篇》献给谢林。1808年，接到谢林来信表示嫌恶《精神现象学》，这并未影响他对《精神现象学》一书做出正确的评价。关于1809年在《耶拿德国文献报》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了《精神现象学》一书的价值与哲学意义。

这时，黑格尔虽然还未“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知名度已有很大提高。有几位中学生非常崇拜黑格尔，黑格尔鉴于他们思想不成熟，认为他们不应当以“黑格尔派”自居。

正如罗森克朗茨所说，黑格尔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不但作为学者，就是作为人，也是成熟得很慢的。直到40岁，黑格尔才感到需要结婚。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尼塔默，希望尼塔默夫人能为他物色一位生活伴侣……

经过尼塔默夫妇的热心张罗，1811年9月，黑格尔和纽伦堡元老院议员卡尔·封·图赫尔的女儿

玛丽·封·图赫尔报巴伐利亚王室获得批准后结婚。这一年，黑格尔41岁，新娘比他小20岁，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虽然她的父母起初反对这桩婚事，但她深深地爱上了黑格尔，总是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在她眼里，他是一个如此才华横溢、富有智慧、知识渊博的人。还有，他的阅历是那么丰富，这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也不无吸引力，总之她被黑格尔深深地迷住了。

新娘聪明、文雅、年轻、漂亮，黑格尔对他的婚姻感到非常满意和幸福。但黑格尔在经济上并没有因与贵族女子攀亲而得到任何好处，那时他正闹钱窘，差点儿因经济困难而延迟结婚日期。

黑格尔认为婚姻不仅是赤裸裸的两性关系，也不仅仅是市民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统一；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的关系，夫妇间的爱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黑格尔的婚姻显然应该说主要是基于他所谓的“伦理性的爱”。

婚后不久，黑格尔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我终于完全实现了……我的尘世愿望。一有公职，二有爱妻，人世在也，夫复何求。”

这固然反映了黑格尔的庸人习气，但也表现出他安心于个人生活，潜心于哲学研究，坦率朴素，没有争政治权力，争荣誉财富的野心。

黑格尔在纽伦堡的安定的学术著述生活并没有因为结婚和家务而打断，相反，幸福的婚姻为黑格尔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新婚后仅半年，20多万字的《逻辑学》（即通常所说的“大逻辑”）五卷问世。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系统的论述了他的唯心辩证法。它标志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已经完全成熟。

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与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相比，逻辑学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富有生气的灵魂；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应用的逻辑学”。

黑格尔哲学由《精神现象学》开辟道路，《逻辑学》的出版问世，使得黑格尔哲学已颇有些声势，为人所瞩目。

1812年，黑格尔的弟弟鲁德威·黑格尔从符腾堡公国图斯加特军校毕业，服役于曾参加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战役，本年战死疆场，未婚。

这年10月，谢林前来纽伦堡访问黑格尔。黑格尔热情接待了这位昔日的好友，但两人绝口不提原本共同感到有兴趣的话题——哲学和理论问题。

1813年6月，黑格尔的大儿子卡尔·黑格尔出生，长大后任埃尔兰根大学历史教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便是由他整理出版的。

1814年9月，小儿子伊曼努尔·黑格尔出生，曾在普鲁士布兰登堡省担任宗教和政治方面的高级职务。

1814年夏天，黑格尔得知妹妹克里斯蒂娜有病在身，遂接来在家养病年余。弟弟已死，黑格尔的同胞仅有妹妹一人了，更加珍惜与妹妹的手足之情。父母双亲早已故去，妹妹终身未婚，作兄长的他能不关心妹妹吗！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家庭观念还是很强的。1815年冬天，克里斯蒂娜病已痊愈。感激地离开了黑格尔的家。

黑格尔在纽伦堡期间，正是拿破仑的统治达到顶峰，继而衰落，最后被推翻的时期。拿破仑对大半个德国的统治导致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因此黑格尔继续支持拿破仑。但是另一方面，当法国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异族统治是和压榨、经济负担和民族屈辱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人民开始起来反抗异族统治。对民族反抗和由于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而引起的1813年解放战争，黑格尔不理解，持否定态度。黑格尔曾经劝说学生不要参加志愿兵队伍，认为他们跟法国占领军的行径如出一辙，所作所为不符合理性和自由的政治原则。尼塔默的上中学的儿子报名参军，黑格尔很是不满，黑格尔把希望寄托在拿破仑的胜利上。

解放战争体现人民对民族统一的要求，体现了对民主的追求和希望。但是，王公和反动的贵族阶层却篡夺了解放斗争的领导权。1815年6月，拿破仑滑铁卢一战惨败退位，波旁王朝复辟，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事件”，他的精神世界就这么坍塌了。拿破仑的倒台成了反动力量的胜利，他们竭力废除先前的改革，恢复旧的统治形式，重新压迫人民，但是反动势力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经济变化，也无力废除已经发生的全部改革。

黑格尔的历史观表现在他写给尼塔默的一封信里，他认为，尽管反动派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社会将继续发展。他写道：“世界精神发出了行驶的命令，这个命令必须服从。”

然而黑格尔相信，这种发展是缓慢的和自发的。因此，他渐渐适应了解放战争后的政治环境。

1815年后，突出地表现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反对反动势力进攻的斗争是和大学生中的进步势力对民主和共和制的要求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对此却不表示同情。

黑格尔在纽伦堡的八年，是他一生中成果辉煌的时期。首先，他写成并出版了《大逻辑》。这是一本在欧洲哲学史上常被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相提并论的巨著。其次，他还讲授了从逻辑学和古希语

的多种课程。这多种门类的学科给他制订了自己的体系，阐发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正如黑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的讲授能力大大提高了，成了一位受听众欢迎的老师。

但是，黑格尔却难于忍受这种哲学上的孤寂，他不断地设法重返生气勃勃的学术园地，再置身于学术上的朋友和对手之中，同时也改善一下经济状况，得到较好著述条件。1816年8月，黑格尔的这种愿望在海德堡大学校长助理道布的热心促成下实现了，最早收到海德堡大学的聘书，紧接着又收到埃尔兰根大学、柏林大学的聘书，黑格尔对后者喜出望外，但只得婉言谢绝。

八 在海德堡

1816年10月，黑格尔向西到巴登公国的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接替弗里斯·弗里斯以所谓宣传无神论思想而不得不离开。这一转变不但是黑格尔梦寐以求的，而且对他作为学术活动家的生活道路影响也是深远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海德堡大学的哲学讲座实际上是柏林大学哲学讲座的阶梯。如果当时黑格尔应聘了埃尔兰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今日的欧洲哲学史也许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1816年10月28日，黑格尔在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训职演说中公然声称“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这其实就是公开承认普鲁士国家的合理性，当年的专制统治的反对派黑格尔现在开始为专制制度涂脂抹粉了。他的这种妥协倾向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赏识。

1817年瓦特堡的节目典礼上，大学生们痛斥暴政和反动派，把反动政治著作和一件普鲁士紧身制服，一条黑森士兵的发辫和一根奥地利下级军官的手杖作为反动的象征付之一炬。他们的一项最重要的要求是统一德国。大学生协会很快遭到德国政府的迫害

和镇压。但黑格尔却从真正国家的概念的立场出发指责大学生协会，尤其指责它的左翼所进行的这种争取民主的努力。

然而，黑格尔并非是封建复辟派，相反地，他对当时的复辟思潮是极为反感的。1815年到1816年，符腾堡等级议会开展了宪法讨论，议员们要求恢复符腾堡的“美好的旧法制”。这就意味着要否定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这25年来符腾堡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重新倒退到中世纪的国家制度。1817年11月，针对符腾堡议会的议员们的复辟行为，黑格尔在一篇评论中尖锐地指出：“他们什么也不曾忘记，什么也不曾学到。最近这25年是世界史上确实内容丰富的25年，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教益的25年，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观念就是属于这25年的；而符腾堡等级议会的议员们却好像是在沉睡中度过这25年似的。”

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反对复辟的政治倾向；而且表明，他十分自觉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思想是和法国革命以来这25年的历史事变血肉相联的。

黑格尔应聘到海德堡大学以及以后两年的教学，都受到卡尔·道布的多方面关照。两人共事的时间不足两年，但由于志同道合，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卡尔·道布长于黑格尔5岁，从1795年起就已经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了。他与黑格尔的相识、相知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1816年7月30日，道布在给黑格尔发出邀请书时，他们两人还从未谋面，可是信中却好像两位老相识在开诚布公地交谈，道布这样写道：“我这样写信，好像我们两人已经认识很久了。然而，直至昨天除了从书目上，从序言上，我实际上并不认识您，或者说，只是从那些为糟蹋您而写的评论中来认识您。”

道布自认为是黑格尔学派中的一员，积极传播黑格尔的哲学观点，费尔巴哈就是在道布的神学讲座上接触了黑格尔哲学，并转到柏林大学，改从黑格尔学习哲学的。

道布在信中对黑格尔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倘若您肯就聘，那么海德堡大学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在您身上有了一位哲学家……哲学家带来勤奋，而名为黑格尔的哲学家还带来很多另外的东西，到现在此地和其他各地都有少数人，从这里看到了一种预兆，这里面有着仅靠勤奋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深受尊敬的人，我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寄托在您对科学和科学复活的高尚热诚上面，现在，在德国各大学里，科学正僵化着。”

为了使黑格尔顺利应聘到海德堡，道布在黑格尔的薪俸报酬、待遇、住房条件方面又几次与有关方面磋商，尽量使黑格尔满意，如此盛情，黑格尔焉能推却。

黑格尔在1816年8月20日的回信中对道布的信任与坦率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写道：“我现在若能被看作是您们当中的一员，就应感到由衷的幸福与骄傲。我将以变得年轻的心情走向为一所大学和科学而献身，并且决不辜负您对我所表现的深情厚谊。正在成为现实的，不久和您，和我的其他好友们亲自相会的希望，使人不胜萦怀，每一想到海德堡，在我眼前就出现了友谊和愉快的景象。”

在附启中，黑格尔开诚布公地谈到“您在我的事情上操劳，以及您对在德国，在我们大学里哲学状况的关心都使我深为铭感……您对我迄今所作的工作的称许，以及您对我在一所大学里所起作用寄予的期望，都使我十分高兴。一个人在科学中所感到的孤寂，莫过于在哲学上所感到的孤寂了。我满怀渴望有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场所，也可以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场所，对我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多么不利。”

后来黑格尔又收到了埃尔兰根大学、柏林大学的聘书，虽然后者更使他动心，但既已承诺他人，一诺

千金，黑格尔忠实地履行了他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朋友的诺言，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信”。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法哲学、哲学史、人类学、心理学、自然法和国家学等课程。

上课之初，听黑格尔课的学生只有4名，后来逐步渐增加，20，30，一直多达70多名。黑格尔在这里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的欢迎和尊敬。

黑格尔思考问题专注，在海德堡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据说有一次黑格尔思考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站了一天一夜；还有一次，黑格尔一面沉思一面散步，天下雨了，他的一只鞋陷在烂泥里，他也没有注意到，只穿着一只袜子，继续往前走。做学问需要心静，酷似中国佛门中的悟“禅”，黑格尔完全达到了心灵上的这一境界。老僧入定，古井不波。

黑格尔在海德堡时期的主要著作是1817年5月作为讲义出版的《哲学全书》。为了此书的出版，道布甘愿担负起黑格尔著作的出版校对这样琐碎的工作，他功不可没。《哲学全书》标志着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最后完成。如果说，黑格尔在此之前的著作都是为这个体系所作的准备，那么，黑格尔自此以后的所有著述都不过是对这个体系的进一步的发挥。

《哲学全书》在1827年、1830年两次修订、增补发表。黑格尔死后，他的学生又汇集多种笔记出版才构成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逻辑学（即小逻辑），

第二部分：自然哲学，

第三部分：精神哲学。

《哲学全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黑格尔哲学思想、自然哲学以及社会政治伦理观点，这一著作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石。在欧洲哲学史上，我们还难于找到第二个可以和黑格尔相并肩的哲学家，以这样紧凑的形式，这样完整地把自己哲学的全部体系展示出来。

黑格尔正处于哲学把自己看作是科学的科学，梦想建立一个无所不包体系的年代。他本人也就是这一梦想的典型代表，他在哲学的各个部门里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每一部门，从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史，都能在《全书》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并且它们都不过是全书相应部分的加深和展开。

《哲学全书》在黑格尔全部著作中，也是用力最多的一部。他一生亲笔写下了并公开出版了4部书，而只有这一部是经过他3次修改的。这种严谨的治学之风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人的“斟酌”、“推敲”字句，语不惊人不要休！

随着《哲学全书》的出版，黑格尔的“黄昏”来到了，他这只“密纳发的猫头鹰开始飞翔了”！（“密纳发”是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罗马名称。“密纳发的猫头鹰”或称“雅典娜的猫头鹰”一般比喻哲学家。）

九 在柏林

1817年12月，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阿腾斯坦上任，他确信黑格尔哲学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且面对着不断掀起的学生革命高潮，他想借助黑格尔来平定人心，邀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当哲学教授。1818年3月鲁士国王签署了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的敕令。

黑格尔欣然接受了一任命，于1818年9月离开海德堡，向西北，顺道访问了歌德，然后到柏林大学就任哲学教席。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年俸一倍于海德堡大学的年俸。当然黑格尔接受这一任命决不仅仅是，并且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有：神学教授施莱马赫，圣经评论家德·维特，物理学教授艾尔曼，稍后还有植物学家舒尔茨等。

柏林时期是黑格尔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在柏林大学，他完成了他那巍峨壮观的哲学体系，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聚集了一大批才智非凡的学生和追随者。黑格尔的哲学在这里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使西方古典哲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就职时，发表了演说，演说一开始，他就颂扬说，普鲁士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精神生活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黑格尔公开美化普鲁士专政制度，粉饰现实，号召人们向现实妥协，表明自己的哲学和基督教的协调。因此，黑格尔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赞助和支持，黑格尔晚年以及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哲学实际上成为德国全国性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成为德国的国家哲学。

在这篇开讲辞中，黑格尔还嘲笑了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指弗里斯等激进派），指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黑格尔宣布：他打算将哲学的真实内容“在诸君面前发挥出来”。

在柏林大学的13年期间，黑格尔讲授过的哲学全书、自然法与国家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史、人种学和心理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宗教史、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或实用物理学等课程。单看这些课程的名称，其种类之繁多，范围之广，你就能明白黑格尔的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了，他简直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黑格尔的讲授能力大大提高了，他成了一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再者，《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这两部宏著的出版，黑格尔

的声名大振，许多人都慕其名转到柏林大学，听黑格尔讲课。

下面，我们来看看黑格尔的一个学生霍托眼里的“黑格尔”吧。霍托认为他在黑格尔的世界观中，找到了他出于一种内心的迫切愿望而经常探寻的东西：生活和艺术的和谐，现实和诗的和谐。

霍托这样描述黑格尔给他的第一个印象：“还是在我大学生活开始的时候。一天早晨，我为了向他作自我介绍，第一次腼腆而信赖地走进了他的房间。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前，焦急地翻阅一堆横七竖八的书刊和纸片。他那过早衰老的体态虽已伛偻，但还保持着原有的刚毅和力量。一件黄灰色的长睡衣从肩头慢慢地顺着他那瘦削的身躯滑落到地上。从外表上看，他既不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也缺乏吸引人的风雅。老的市民阶层的令人敬重的率直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又一个特点。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脸庞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整个面容表情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没有一点生气，在他的这些表情中看不到一丝破坏性的热情，但却反映出他长期默默无闻地进行思考的日日夜夜。怀疑的痛苦，无法抑制的思潮的激荡，似乎都没有使他40年的思考，探索和发现感到苦恼和无所适从，只有那些更丰富、更深刻、更严密和更可靠地揭示出早已被

幸运地发现的真理内核的坚韧不拔的追求，使他的额头、双颊和嘴巴布满了皱纹。

“整个头部有一种多么令人尊敬的神态，高高的鼻子显得气度高雅，微微突起的额头，沉静的下颚。大小事情上的忠实和正直，以及把主要精力用于在真理方面求得最终满足的明确意识，所有这些都和他的整个容貌上生动地表现出来。”

黑格尔不仅是一位勤于治学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的好老师。黑格尔每次上课前总要精心准备，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带着他认真选择的各种材料，特别是那些写满附录，注释等等的大笔记本。黑格尔讲课只注重课的思想内容，而不在意课的形式是否生动活泼风趣以及是否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听黑格尔的课，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并且善于抓住他在讲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思维的火花，这样，你才能“渐入佳境”，真正领悟黑格尔深奥的哲学思想。

霍托在他的《生命和艺术的新探》一书的结尾部分对黑格尔的教学方法作了最生动的描写：“几天以后，当我在讲台上又看到他时，我最初对他的讲演方式和内在的思想进程都不能理解。他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低头坐着，一边讲述，一边翻阅和查看自己的大笔记本，时而向前，时而向后，时而下面，时而

在上面。经常的咳嗽声干扰了讲演的正常进行。每个句子都是单独出现的，并且由于紧张讲得不很连贯和没有条理。每个单词、每个音节只能勉强地从他的斯瓦本方言的低沉音调中，得到一个非常基本的表达重点，仿佛每一个词都是最重要的。然而，这整个情景引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那么一种尊重的情感，并且由于一种十分认真的素朴的思想而被吸引住了，以致我尽管感到很不适应，尽管我只能从他所讲的内容里懂得很少的东西，但却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被心悦诚服的吸引住的人。虽然我在短时间内通过勤奋和坚韧不拔还不能完全习惯于黑格尔讲课的这种外在的方式，但其内在的优点却越来越明显，这些优点和那些缺点融为一个在自身中具有自己完善境界的统一整体。

“他从事物最深邃的基础中得出最重要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是他多年前反复深思熟虑的和深入研究过的。可是要使它们切合实际的发挥作用，还必须由他自己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重新提出来。对于这样一种困难而艰辛的直观的形象思维，除了采用讲课的形式以外，采用任何其它的方式都是难于想象的。如同古代的预言家那样，他们愈是顽强的与语言作斗争，他们愈富有表达力，凡是他们斗争过的东西——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他也以笨拙的认真的态度进行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

“他完全埋头于对事物的研究，他似乎仅仅根据事物，为了事物本身，而不是为了听讲者从自己的精神中去阐述事物。事物都是从他的精神中产生的。一种近乎慈父般的透彻的讲解缓和了那种使人对这些艰深的思想望而生畏的呆板的严肃气氛。

“他开始有点结结巴巴，讲一段重复一遍，再停顿一下，一边讲一边思考，他好像永远也找不到适当的言词，然而一旦当他选择了一个词汇，它似乎又是无比恰当的，不常用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

“最重要的东西总以为马上就要讲到，但不知不觉地已经全部讲完了。现在，人们理解了一个命题的明确含义，并且殷切地希望继续深入下去。但这是徒劳的。思想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而经常是以一些相似的言词围绕着同一观点转来转去。如果由于疲劳而分散了注意力，几分钟以后又突然不知所措地回到讲堂上，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失去思想内在的联系。由于通过对一些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中间环节的小心谨慎的引导，每一种完整的思想还是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出现不同的看法和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彻底解决又能够促使矛盾的事物最终走向统一。

“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其安然和宁静的姿态，不断地在那些似乎无法解释的事物的深奥之处发掘和探索。这时，他的嗓门提高了，眼睛在教室里炯炯发

光，并在炽热的信念之火中闪耀，他用他那从不贫乏的言词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只有在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上，他才显得笨拙和无能为力。他绕来绕去，踌躇不前，常为这些事情而苦恼。

“反之，在那些最抽象的概念和最大量的现象之中，他却能巧妙地运用自如。他能在迄今难以达到的高度上，提出任何一种观点，甚至是一种很独特的观点，并能描绘出它的全貌。

“用这种方式，他非常出色的描绘了时代、人民、事物、个人。他那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目光使他能够在多个方面揭示出事物地本质。他的早期的直观能力直到暮年仍没有失去在其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朝气和活力。”

正当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宣讲他的哲学的时候，柏林大学还来了另一位哲学家，他生前屡遭挫折，死后才声名远扬，他就是悲观主义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

叔本华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他“无国、无家、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又无朋友”。

阿图尔·叔本华于1788年2月22日生于但泽。但泽忽而归于波兰，忽而归于普鲁士。1793年，但泽划归普鲁士管辖，叔本华的父亲宁可损失1/10的财产，举家迁往自由城市汉堡。叔本华的父

亲希望他成为一个不囿于一国之狭隘观念的“世界公民”，给他取了一个西方各国文字写法都相同的名字，阿图尔。这确实使叔本华没有形成把自身认同于某一地域的国籍观念。这就是叔本华的“无国”。

“无父”指叔本华背叛了他父亲生前严令指示给他的人生道路。叔本华的父亲是一位继承祖业的商人，知识丰富，天资颇高，他刻意安排要叔本华成为一个商人，他曾带叔本华出国旅行，开阔叔本华的眼界，在叔本华12岁时又将他送到汉堡的龙格私立学校，那是一个培养未来的商业大亨的摇篮。然而，叔本华对商业根本不感兴趣，继承父亲遗业的一段商业生意竟成了叔本华一生中最抑郁凄惨的岁月。叔本华的父亲死后，叔本华几次在信中恳求母亲，才得以在19岁解脱。

叔本华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小19岁，聪明美丽而富有才华，曾出版过不少小说和游记，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叔本华的父亲死后，她孀居魏玛，办了一个文艺沙龙，与当时云集于此的雅士文人频繁往来。叔本华性格孤僻，看不惯母亲的放浪交际，又怀疑其父的郁闷而死与母亲的寻欢作乐有关。所以母子关系十分不睦，经常争吵。叔本华的母亲也越来越无法忍受叔本华的神经质的性格。她在给叔本华的一封信中说：“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生活。我越了解

你，越感觉增加痛苦。只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晚上和不舒服的梦境。”

1814年，叔本华搬迁到了德累斯顿，永远告别了他的母亲。

叔本华终身未婚，无妻、无子、无家，也没有朋友。1860年9月21日，当叔本华因肺炎病故时，身边除了那条被他称为“世界灵魂”的褐色的卷毛狗外，再无任何一个亲人。

叔本华在德累斯顿度过了4年平静的日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使他不必为衣食奔走，而安心钻研哲学。

1818年，30岁的叔本华写成了洋洋50多万言的唯意志主义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它为西方非理性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石。在这本书中，叔本华断言，智力越发达，痛苦也越深重，因此，天才最痛苦。

叔本华曾对这本书寄厚望。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说，我活在世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献的99%都已经完成了，其余的只是一些次要的东西。”

1818年3月18日，叔本华给出版商洛克豪

斯的信中说：“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既决不同于新的哲学流派玩弄词藻，空泛无意义的妄谈，同样也根本有别于康德以前时代废话连篇，平淡无奇的饶舌。”

然而，出版商洛克豪斯对此书前途颇为忧虑：“我担心你的书只能是一堆废纸，但愿这一担心不会兑现。”

洛克豪斯的话不幸言中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部书总共销了不到100部。这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当时受到世人青睐的正是蜚声哲坛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叔本华的书同这些人的思想唱反调，光顾者自然寥寥无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时代不接受它。

叔本华对这书的命运忿忿不平，大骂哲学界是想用“沉默法”窒息天才。不过当时他尚未气馁，要到大学讲坛上一展身手。

1820年，叔本华向柏林大学提出当教师的申请，被接受为编外讲师。3月23日，叔本华在同人面前举行了有关因果性原理的试验性演讲，出席这次讲演的黑格尔在讲演结束后，就关于动物的行为受动

机所支配的观点向叔本华提出了讽刺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还是在大学议定书上签了字。依照传统，几天以后，新讲师又以拉丁语作了关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的演讲。

在柏林大学，叔本华共担任了24个学期的编外讲师。叔本华有意与当时名声最噪的黑格尔较量一翻，他非常自信，要求在黑格尔开课的同一时间开课，唱一场争夺听众的对台戏。结果，叔本华一败涂地，学生们都被黑格尔吸引去了，黑格尔讲课的教室坐无虚席，走廊上甚至还挤满了人，听叔本华的课的学生只有三人，未授完全课程，叔本华就草草收场，愤怒离开，在随后的23学期中，叔本华的课因无人听课，而只得撤销。

叔本华彻底失望了。他在柏林大学无法与黑格尔一争高低。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拥有什么呢？甚至没有值得花费力气的一定数量的听众。我无论生活得好坏都不喜欢这个巢。”

叔本华认为：他和他的著作所遭遇的极度轻视表明，或者是他有负于当代生活，或者是相反。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都只能沉默。于是，这位天才的哲学家益发郁闷悲观了。

后人对这段轶事非常感兴趣，其实，叔本华所遭遇的一切除了表明他“生不逢时”之外，决无其他意

义，更不能丝毫有损于他的伟大的天才，他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叔本华比黑格尔更加伟大，前者是一位创始人，而后者是一位集大成者，众所周知，在当时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叔本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非理性主义的大旗，始终不改其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魄力，还有何等的“不凡”。西方非理性主义就由此揭开了第一页。再者，是非自有公论，历史评价一切或许是最公平的，在叔本华的晚年以及在他死后，其思想才开始为世人认同，才开始发生影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叔本华的思想丝毫不逊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

天才生不逢时是世上最大的悲剧。叔本华是这些悲剧中的代表作。

尽管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但在实际上他和普鲁士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的。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的思想已经非常保守，也越发不赞成革命行动，这在黑格尔1821年6月致尼塔麦的信中可以反映出来：“我一方面是个胆小的人，另一方面，又喜欢平静，每年看到起场暴风雨，真不舒服，尽管我相信一场大雨顶多有几滴打在我身上。”

普鲁士政府聘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教，原本是

想利用黑格尔来抑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倾向，可是当普鲁士政府不断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疯狂逮捕，搜查大学师生时，虽不赞成革命行动的黑格尔却对他周围在思想上比较激进的青年大学生深表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承担风险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青年学生而四处奔走。因此，黑格尔本人后来也成了官方怀疑的对象。普鲁士的王太子甚至当面指责黑格尔，说黑格尔的学生甘斯在课堂上宣扬共和主义。

黑格尔喜爱音乐，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听音乐会，这一兴趣终生未减。

有趣的是，歌德的学生、语言学家、出版家帕蒂提到，有一次，莫扎特音乐演奏会结束了，黑格尔以钝拙的言词表达自己实在满意，引得乐队指挥史莱因后来对帕蒂说：“这一来，我算喜欢这位口吃的哲学家了。”

1819年，少年音乐家门德尔松，从外地演出载誉归来。小门德尔松是著名启蒙哲学家，犹太人莫泽斯·门德尔松之孙，其父柏林银行家经常为其举办家庭星期日音乐晚会，招待上流社会，文化艺术界人士，黑格尔、大洪堡，梅林姆均为常客。

黑格尔在他适意的地方，他的社交总是很朴素而不单调，又很愉快。在柏林，除了门德尔松家之外，瓦恩哈根·封·恩泽、法伊特这几家都是黑格尔经常

出入的，他在那里接触学术文化界人士以及一些政要教会人士。在晚会上，黑格尔始终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欢畅的、健谈的客人，人们都感到少不了他，对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愉快的回忆。

1820年10月，黑格尔完成《法哲学原理》手稿，这本著作于呈送检查官一年之后，得以出版于柏林。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实行王位继承法的君主立宪制是所谓最好的国家形式。他对贵族作了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法的观念，为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进行辩护。这本书是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妥协的纲领。

《法哲学原理》一书出版时，黑格尔给普鲁士王国总理大臣写了一个附函，说明这本书出版的宗旨。附函中，黑格尔说他的著述的宗旨在于：证明哲学是和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是同普鲁士王国有幸在英明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的光荣。

阿腾斯坦大臣复函黑格尔，赞赏新著，称他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哲学有两段极为精采的论述：

其一为：

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过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之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便想象任何东西。

随后，黑格尔很幽默地说：

这里就是罗陀斯（《伊索寓言》上说，有一个人自吹在罗陀斯跳得很远，别人听了不信，叫他当场表演。），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

其二为：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显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

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飞起。

在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必须在现实世界已经经历了形成过程并且已经成为“实在的东西”之后，才能构思他们的哲学体系，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两段话所共同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哲学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同样，每一个人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这反映了黑格尔的很强的历史逻辑观，他将个人、思想都放于它们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而不是理解为抽象的人及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可取。另外，在这两段话中，后一段话其实是对前一段话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1820年6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名批评了弗里斯，说他是“自封为哲学家的那批肤浅人物的头目”、“大摆哲学家架子的浅薄大王”。对此，弗里斯也反唇相讥，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为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为符腾堡王室服务，而今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托庇狱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云云。

1821年，《海德堡年鉴》上刊载了由保卢斯执笔的评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保

卢斯攻击黑格尔是愚昧无知并且故作高深，是“新瓶装旧酒”、“炒冷饭”，重复着别人早已说过的观点，最后特别批驳了黑格尔把合理和现实相等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经验中现实的东西都要是合理的了。

对弗里斯的讥笑，保卢斯的评论，黑格尔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信中这样写道：“刚才我听说，在《海德堡年鉴》上似乎对我的自然法进行了评论，而且是用我现时只在这本杂志上才看得到的那种蛮不讲理。我听到的只有这么多，并且很想，尽管您和亨利希并不鼓动我，更多的知道这篇印出来的东西对序言说了些什么。我从这里就猜到是我的老同乡保卢斯对这样一个既无知又傲慢，用施氏本话来说蠢驴那一样的小宗派，我以我的序言给予迎头痛击。这个小宗派习惯于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现在有点奇怪，为什么学术界有人对它不肯卖帐，甚至竟敢公开说出和它相反的话。而这个领域是这个派别特为习于发号施令的地方。他们自以为对此有一种特权，我已经很看到了一些朝向我的难看面孔。至少是板起的面孔。以前他们不能够把我说说的打成施马兹派（施马兹派：柏林的法学家提奥多·安东·海因利希·施马兹曾于1815年写文章攻击时代精神和爱国团体，认为它们具有革命情绪。施马兹受到施来马赫·卡卢斯和大

学生联合会的反击，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并且更难于给事情定罪名。”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仍然忠于自己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并竭力借助于迂腐晦涩的言词隐藏着和发挥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黑格尔终生肯定法国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力图从哲学上论证由法国革命所掀起的历史新潮流的势不可挡。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著作中最为保守的一部。可是，恰恰就是在这部最为保守的著作中，黑格尔论证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性，从而“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他还在此书中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著名命题，以此来论证普鲁士封建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也不相同。在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看来，这是在为其存在作辩护，宣扬普鲁士政府是一合理存在，因为这一命题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普鲁士政府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合乎理性的，又因“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

的”，故普鲁士政府能够存在，其存在有根据——合乎理性。这一命题也引起了黑格尔学派的反对派的猖狂叫嚣，他们误认为黑格尔将合理与现实相等同，如保卢斯。另外这一命题也引起了有激进思想的革命者的不满，认为黑格尔在替普鲁士政府的存在作合理论证。其实在这里，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在这一命题中所用的“现实的”一词，所谓“现实的”并非指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的存在，而是指现实社会中那些有必然性的存在。黑格尔其实将现实社会的存在分为两类：一为有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现实的”；另一为无必然性或已丧失必然性的存在，这些都是“不现实的”。根据黑格尔的本意，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指：凡事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如有必然性，则可以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超过了这一历史阶段，这一事物就有可能丧失必然性，则不能存在，如若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存在，并且迟早是要被另一有必然性的新事物所取代的。

恩格斯对此作辩证分析，引伸出它的革命意义：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凡是合理的、现实的东西都会失去它的必然性，变成不合理的、不现实的，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要死亡的。”

至于黑格尔本人是否理解这一警句的革命意义，哲学史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据说，有一次海涅与黑

格尔交流思想，当海涅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儿困惑不解时，黑格尔颇有点奇怪地笑了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说过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当发现只有一个人听见了他的话时才平静下来。

普列汉诺夫评价这桩轶事时认为：海涅认为黑格尔本人了解自己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害怕把它表露出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这种害怕表露其革命思想，并且将革命思想隐藏于晦涩的语言之后的做法称为：黑格尔这位“古典哲学的宙斯”身后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还是古语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哲学方面，谢林曾是黑格尔的引路人，黑格尔也曾是谢林哲学的追随者，然而，正是从谢林哲学出发，黑格尔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使自己的哲学远远超过了谢林哲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是黑格尔的学生，然而，多年以后，也正是他，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身于书香门弟，他的父亲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讲师和教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刑法学家，在德国和欧洲学术界颇负盛名，后来曾在班

堡和安斯巴哈担任上诉法院院长。费尔巴哈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也都是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费尔巴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在慕尼黑和班堡上教会小学，13岁时进入安斯巴哈文科中学。据有关文献记载，他当时“具有诚实坦率的品质，爱整齐，守秩序，沉默寡言，性情平和，还以品行优良，勤勉用功而为人称道。”

1823年秋，19岁的费尔巴哈进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学习神学，并在那里结识了道布，费尔巴哈在1823年的一封信中对道布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有人把道布称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浅薄无知，出于思想偏狭。道布极其勤奋地、踏实地研究了所有的哲学家，他不仅阅读和背诵他们的著作，而且自己加以发挥，加以再创造。他本人就是个最具有思辩能力，最善于思索的人。他不是随意罗列，而是把一切都置于深刻、严格的科学基础之上。对这一切都按其内在的规律的必然性加以最确切、最严格的证明，让一切都在理性的阳光下把身身展示出来。所以，一切都能清楚地呈现于眼前。他仅仅在活生生的概念和意识的光明王国中生活着、工作着，而对那些神秘主义者的含混观念，模糊情感恨得要死。例如，在教义学导言里，在认识上帝可能性这个必然产生的问题上，他和整个批判哲学及其全部

雄辩的论证针锋相对，并加以无坚不摧的攻击和无可辩驳的反驳。一个神秘主义者用他那软弱的稻草棍长矛，是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把康德拉下马来。稻草棍只要碰到一点结实的东西，就会寸寸而断。缺乏思想的武器也不是真正有效的武器，用这样的长矛，最多不过从外表形式上，来守护他自己情感体系的王宫。”

后来，费尔巴哈又在1825年1月29日的信中称道布为“实现了神学和哲学真正统一令人肃然起敬的典范”。

就是在道布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忠诚的传播者那里接触了黑格尔哲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24年4月，费尔巴哈转学到柏林大学，改从黑格尔学习哲学。

1824年4月21日，费尔巴哈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到：“亲爱的父亲，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打算在这个学期主要学习哲学，这样，我就在这学期把规定的哲学课程扎扎实实地学完，我在听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由于我听过道布令人难忘的讲课，特别是他对黑格尔哲学那种重点突出、而又清楚周详的讲授，使我再听黑格尔就容易得多了。他（指道布）那种研究神学的方式和方法，必然地要导致黑格尔哲学。”

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费尔巴哈听完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逻辑学甚至听了两遍。他感到黑格尔哲学使他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世界，他把黑格尔看作是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

根据费尔巴哈的亲身经历，认为黑格尔学派的创始人黑格尔确实有着他的追随者不可企及的优越之处。1824年5月，费尔巴哈在听了黑格尔几周课之后，写信对他父亲说：“我上课虽然不过4周，然而已经深深感到，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周里，使我受益非浅，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埃尔兰根和其它大学4个月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在道布的讲课中感到模糊难懂，或者只是偶然地、孤立地提到的那些地方，现在通过黑格尔的几次讲课，我就豁然贯通了，我相信，至少已经认识到其中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道布在我心里播下的种子，已经变成一片青葱的幼苗。

“您不要以为，我是自我吹嘘，我决不做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事，而且我无必要给自己涂抹。如果一个人，在到黑格尔那里之前，就通过像道布那样的人，受到准备教育，思想上得到锻炼，内心深处对一切事的原则，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他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就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强大感染是不足为奇的。就是同样一块石头，檐头上的细弱水滴，几百年都无

法把它打穿，而怒潮般的洪流却能很快磨光它，凿出洞穴，把它那僵直的体态化作美丽的杯盂。亲爱的父亲，我毕竟还不是块顽石，是吗？

“黑格尔的讲课，远不像他的著作那般晦涩。我甚至可以说，他的讲课是清楚易懂的。因为他很注意大多数听讲人的意见和不同程度的理解力。此外，在他的讲演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即使他还没就事、概念、观念的本身来发挥，或者说还没有纯粹和单纯地就它们的固有因素来发挥，他也总是紧紧地围绕着事情的核心，而不去俯拾不相干的补充和比喻，却是在思想的其它形态和方式的显现中指出思想，在人和日常生活的最初、最直接的意识中揭示思想，令人憧憬，思想在这里也是作为本质部分而存在着，只不过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听黑格尔的课，可以在概念中得到直观，从直观中得到概念。”

费尔巴哈喜欢听黑格尔的课，但他不想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更不想成一名“黑格尔主义者”，在1824年4月21日费尔巴哈写给父亲的信中表达了这一想法：“我喜欢听黑格尔的讲课，但不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一位对总监督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神学学生，听到我对他说，我想听黑格尔的课，就自以为是地推论说：‘那么您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人们可以听黑格尔的课，并且是认真勤恳地

听，但并加入他的学派，正如那关税侵吞者也颇足智多谋，但人们并不因此称他为黑格主义者。而且在这个学派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像那个独眼巨人息克罗普一样，也不是用温柔的情话去赢得海的女神葛拉提亚，去赢得智慧，而是失去了她。”

费尔巴哈立志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希望自己能够在哲学的以太中永保青春，找到自己最高的幸福，为此，费尔巴哈甘愿做个从旁边促进哲学的布道者，但是费尔巴哈认为一个哲学家除了哲学之外，还应谙知自然科学，这样他的哲学体系才能完整。

“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哲学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泉源……我就像一个贪婪者那样，想把一切据为己有，而且不是当作经验的积累，而是当作系统的整体，去据为己有。我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边界的。我要把大自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怯懦的神学家在大自然的奥秘之前惊慌失措，物理学家对大自然则误解其意义，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满地解决大自然的问题。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的铭刻在心中，它不是医生病床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那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究根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生命的尽头。

把上帝和自然这对美丽的双生姊妹，从他们的墓穴中挖出来，哲学这就有了绕之而转动的太阳轴心，才能看到自己的光明前程，才能长成为一株繁花满枝，硕果累累的生命之树。”

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学习了两年哲学。1826年，他告别了黑格尔，说：“我听了您两年课，我两年来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但是，现在，我感觉到需要就教于与思辩哲学直接相对立的其他科学，即自然科学。”

就此，费尔巴哈结束了其在柏林大学的哲学学习，转到埃尔兰根大学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1841年，费尔巴哈在寂静的乡村布鲁克堡完成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此书一出版，就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到广泛的注意和热烈欢迎。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本书一下子消除了黑格尔哲学的矛盾，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

不过，甚为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他不但丢掉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而且也丢掉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果——辩证法，即他是完全否定了黑格尔哲学，而不是批判地继承它。对

此，恩格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费尔巴哈在倒洗澡水时，连同水里的婴儿一同倒掉了。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其革命性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正如黑格尔后来批评谢林的“同一哲学”，嘲笑“绝对同一”，认为“黑夜观牛，凡牛皆黑”一样，费尔巴哈后来也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指出它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惊人的类似总在历史上重演。

黑格尔虽然受邀离开了海德堡大学，但是他与道布的友情并没有间断，两人不断书信往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仍是很好的朋友。

在理论问题上，道布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追随者。为了传播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研究黑格尔的著作真称得上是孜孜不倦。

1821年道布已经是一个往60上数的人了，还是以极大的毅力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为《精神现象学》开设专门课程，认为：研究神学的学生如果不先去研究这门有关意识的科学，将徒有其名，一无所获。道布在1820年9月30日致黑格尔的信中写道：“自您离开我们之后，我每日，几乎是每时，都专心埋头于对您的研究，并且几乎是一直和您在一起，只是在现在我才开始真正充分认识到您的离去对

我们的损失是多么巨大。我已经以最大的努力研究了您的逻辑学，只有这样，现在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对我才终于是了如指掌了。在我看来，它就是教义和道德研究所围绕的中心……我在欢欣鼓舞地等待您的，据我所闻，不久即将出版的自然法（指《法哲学原理》一书）。”

黑格尔对老朋友的著述出版也非常关心。他在 1821 年 5 月 9 日写给道布的信中写道：“您可别让您的教义和道德著作的出版落空啊！我更迫切要求的是教义学，我今年夏季想开宗教哲学，据我所知施来马赫的一本教义学正在印刷之中。我忽然想起席勒在《克塞尼》中的诗句：

尽管人们长期使用着伪币，
但最后他总要把钱包掏出来！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从这个钱包里倒出来的还只是些伪币。在他的神学杂志上有关前定论的文章，在我看来是极其空洞无物的东西。”

1821 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出版以后，黑格尔立即邮寄一本给道布，道布认为他收到了一份比一切都珍贵的礼物，并且称赞道：“您的《法哲学》已在神学道德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

它的影响要盖过教义神学。假如某些职业法学家能像我这样认真地学习它，那么事情很快就会有所改变，而法的实施就要比现在更好些，出现从所未有的良好的情况……在您的《法哲学》中，您对第140节的那一条注释，比我名为《犹大·依沙里奥》的有关善与恶关系著作的全部篇章所完成的还要多。最亲爱的朋友，您最好不要读那些篇章了，因为不论在材料上和观点上对您还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呢？您不是远远地超过了它吗？”

道布是那么推崇黑格尔哲学，以至于他认为《法哲学原理》第140节的那一条注释，就使他的全部著作都不必再读了，读了黑格尔的关于伪善、诡辩等所谓道德主观性的主要形式的剖析，实在是犀利、隽永、洞穿肺腑，烛照灵魂。

第一是伪善。

伪善颠倒善恶，混淆是非，把坏事说成是好事，把罪行说成是美德，但正如能说谎，能把存在说成不存在，是智力发展的表现一样，伪善是道德达到高度水平的标志，不过是主观性的标志。在这里，主观性是唯一的根据、准则，不论多么坏的事情，只要找到一条理由为根据，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

其次是诡辩。

诡辩是道德主观性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的形式。

在伪善中尚残存的善恶界限在这里完全泯灭了。总之一切事情都可以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是出自善良意志，因为，这里所谓的“善”，完全是空洞的范畴，其内容完全是个别主体的主观意愿所给予的；一个行为主体想要做的事情，自然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这样任何的外在理由和根据都不需要了，“伦理学被归结为个别人对人生理论所持的信念”。在这样主观信念的支配下，人们可以无视一切客观事实，践踏一切客观规律，“有多少人被对信念的这种情绪所支配，而导致各种失误中的最大失误啊”！

黑格尔指出，道德主观性的最高形式是否认真、善、美一切内容规定的 *Ironie*。正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认为一切对真、善、美的规定都不过是些矛盾百出的，应受到嘲弄的，个人所私有的信念而已。因此，主观性是终审法庭，最高裁判。一切事实和规律都一文不值，任我玩耍，随我嘲弄，只有我才是最高的主宰。

“我凌空飘荡，俯瞰广阔无垠的空间，呼唤各种形影，而又把它们消灭。”

在这里，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相一致的辩证法原则仍然贯串着，黑格尔指出行为须以某种外在权威为依据，是基督教道德，主观信念和善良意志和一种“经常提到的自出心裁的哲学”有直接联系；对内

容和规定的嘲弄态度是“费希特哲学的产物”，它宣称自我是绝对的，是普遍的本已性。主观性的这种最高形式只有在高度文化时期才能出现，这时，信仰已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它的本质仅仅是“一切皆空”。

道布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不仅自己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黑格尔哲学，而且他还做到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一点：主动担负起了《哲学全书》烦琐而劳累的校对工作，这是何等无私！

道布在1826年3月29日致黑格尔的信中说：“……最令人高兴的是听到您《全书》第二版的稿子送到了出版人奥斯瓦尔德这里，如果您愿信托我的话，我将愉快地把出版的校对工作担负起来。”

对于老朋友的这番好意，黑格尔接受了。1826年12月19日黑格尔写信给道布：“印就的《全书》第13印张已于今日收到，我几乎每天一有机会就要来叙说，对您所承担的麻烦工作的感激。我但愿在这修订本中我所设法增加的趣味，能得您一些鼓舞和支持。”

1827年5月，《哲学全书》第2版的校对工作基本完成，道布又把清样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尽管他以前倍加小心，但仍然发现多处印刷错误未及改正。他细心地把已经发现的地方作了记号，并且建议黑格尔在书的结尾加印一勘误表，把全部错误订正列

在一页上。道布在13日的信中写道：“这种校对工作，可以说是我近来所做的那些最喜欢的事情之一，这部分由于在这里面有许多新的教益，部分由于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尽管它在将来还在大学里为进行真正科学的教学之用，然而您的《全书》将是一本，没有它哲学就要降低水平，而唯有按它才能有内容充实的教学的书。”

道布像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样维护着《哲学全书》的声誉，为了狠狠打击那些黑格尔哲学上的“只会狂吠的敌手们”，道布写了一篇关于《哲学全书》的摘要和评议，并且建议黑格尔待那些“只会狂吠的敌手们”说人话之后，再行出版《哲学全书》（第二版）。

《哲学全书》第二版和第一版相比，内容有所变动。在第二版的序和结尾部分里，黑格尔反对那种把宗教信仰归之于心和情绪，排斥思辩思维，排斥哲学观点。黑格尔主张思辩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的联合一致，这不但是黑格尔的神学主张，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精神哲学》的最后部分也正是依照这样的意图而安排的科学结构。

黑格尔并不认为，自己这种把思想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相联合的神学观点是什么发明创造，它是古代希腊观点，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复活。在《哲学全书》的结尾，从第二版起，他从《形而上学》第1

2 卷第 7 章，直接摘录了一段话：

“作为思想的思想是对至善自身的思想，也就是对最最至善的最最的思想。理性通过把握被思想的东西而思想自身；被思想的东西由于触动着和思想着而成为被思想的东西，所以思想和被思想是同一的。因为思想、理性就是被思想东西，对本质的感受。能具有，才具有现实能力、积极性，人皆尽知具有现实能力者比不具有现实能力者更具有神圣的理性，而静观是至福，是至善。假如我们暂时具有的福分和神的永恒具有同等，是奇怪的；假如更大些，那就更加奇怪了。事情就正是这样。神赋有了生命，因为理性的现实就是生命，神就是现实性；神作为现实性的现实性是至善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们曾说过，神是永恒的，至善的生物，所以生命，无限同在和永恒都赋之与神，神就是如此。”

这段话，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总结，也是黑格尔神学观点的注脚。

黑格尔晚年对宗教仍持批判态度。据说，黑格尔晚年讲授宗教哲学时，他多次引用歌利利布·封·希伟尔的《上天的生命进程》这一“最幽默的著作”来嘲笑那些信神的庸人：“神父布里斯昨天向我谈了敬爱的上帝的伟大！我忽发奇想，敬爱的上帝可能管每只麻雀、每只金翅雀、每只红雀、每只虱螨、每只蠓

虫，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想想吧！每个蠓虫彼此是如此相似，以致人们可以发誓说，它们都是兄弟姊妹，而敬爱的上帝竟然叫得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

这一段精彩的文字对“上帝”的嘲讽是多么辛辣和无情。可见，老年黑格尔的心目中也是没有传统神学“上帝”的位置的。这正如苏联宗教米·费·奥甫相尼科夫和阿·古留加所说：“黑格尔的学者观同教会的正统宗教观不同，”“关于神性的传统观念，黑格尔不论在青年还是在老年时期，都是加以拒绝的。”

《法哲学原理》、《哲学全书》（第二版）的出版，使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并形成了一个以黑格尔为中心的黑格尔学派，黑格尔的辉煌在柏林达到了顶峰。

黑格尔哲学在各地都有拥护者，如海德堡大学的道布；埃尔兰根大学的卡普；尼斯堡的阿贝格，后来阿贝格文到了布雷斯劳；柯尼斯堡的西茨，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布雷斯劳和哈勒的欣里希斯；拜洛伊特的加布勒等。黑格尔经常同他们通信，保持联络。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已经极为广泛，但是，黑格尔不同意将他黑格尔的哲学用“黑格尔哲学”一词来表示，这一点在1819年黑格尔写给欣里希斯的信里，黑格尔作了明确表示。

心灵之约可以跨越时空。

歌德年长黑格尔 21 岁，他们两人开始结交时，黑格尔才是个刚踏上耶拿大学讲台的讲师，还是一位编外讲师，没有什么名气，而歌德早已载誉全欧，在魏玛公国历任要职，可以说是一位“显赫人物”。黑格尔对他这位老前辈一直都是毕恭毕敬，恭维备至，在信里一直以“大人阁下”相称。黑格尔走上学术道路，歌德对他关怀备至，从精神以至物质待遇上都是鼓励提拔，无不尽力。黑格尔和歌德的这段忘年交持续了 30 年，直至黑格尔去世，他们两人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之中反映出来是情愫满怀，真挚动人。

黑格尔本人富于文学艺术的修养，直到花甲之年还自己亲自动笔写诗，而歌德自己不但在诗里充满哲理，很理解哲学对时代的作用，也注意哲学的进展，晚年，他还写信给黑格尔，希望看到他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他写道：“希望您不久用自己的著作让我高兴一下；我以最大的可能经常保持着对哲学家赠品的兴致，并且每当我能够得到一种自然不曾赋予我的方式研究出的东西，就高兴不已。”

黑格尔初到柏林时，歌德对光学最感兴趣。歌德把牛顿的理论，斥之为“最愚蠢”的理论，“最坏的形而上学”。和牛顿相反，歌德认为阳光不是由诸种不同的颜色组成的，而是“最纯净的上天的赠品”；颜色不是不同的物体对太阳光反射的结果，而是光和

影、明和暗这两种相反因素的统一，是两者结合的产物。歌德把他的光学派的这一基本思想用诗的形式，作了概括：

谁把光的同一性分劈了，
如果你们称之为错误，
我们则必须称它做愚蠢；
这样的人将成为色彩
王国的主人，若是他聪明地
让光和影、明和暗结成婚姻。

黑格尔无保留地站在歌德一边，猛烈地抨击牛顿学说，认为歌德“明中有暗”的理论是既明白清楚有充分根据，而又富于教益的理论。在《哲学全书》（第二版）的第二部分《自然哲学》第221节里把牛顿的颜色理论称做“最坏的反思形式”。黑格尔还开展实验来证实歌德的理论，组织力量扩大歌德理论的影响。

1825年，黑格尔这时也已同歌德一样，站上了德国文化的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他在信里依旧满怀深情地向歌德说：

“您……向我们提供了难于忘怀的鼓舞和享受，您向我们提供的这种享受促成了我们对您一种单方面

的联系，在这里全部讲话都由您独力承担；可以这样说，我们连气也不敢出，为了不致干扰吮吸您的精神芬芳，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在我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全部历程时，无处不看到您的遗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作是您的一个儿子。我的内在精神从您那里获得了恢复力量，获得了抵制抽象的营养品，并把您的形象看作是照耀自己道路的灯塔。”

1826年8月，黑格尔接受了学生们为他和歌德举办的联合生日庆祝会。黑格尔和歌德的生日正好前后相接，一为二七日，一为二八日。这时的黑格尔已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哲学界，犹如歌德主宰文学界，贝多芬主宰音乐界。自此，自豪的德国便产生了每年两天的假日，以示庆贺。

1827年10月18日，黑格尔应年迈的歌德邀请，暑期游历巴黎归途经魏玛探望歌德，漫谈双方都感兴趣的辩证法问题，歌德很赞赏黑格尔的自然和历史观点。歌德的秘书爱克曼记下了当时的会见。1829年，黑格尔作了秋季旅行后，于9月11日绕道魏玛，最后一次拜访歌德，这一年歌德已经80岁了。黑格尔也已经59岁了，两年以后，黑格尔先于歌德离开了人间。

1807年11月，黑格尔和谢林的友谊由谢林

一方结束。20多年后的1829年秋天，年届花甲的黑格尔来到游览胜地地温泉浴场卡尔斯巴德，在这里与谢林不期而遇。两位年轻时的同窗好友都不胜惊喜，他们共进午餐，同游附近的山岭，畅谈政治，在“充满旧日热诚友谊中”同住了5天。黑格尔立刻把这一消息向他的夫人和友人作了报道。但是，黑格尔和谢林谈这谈那，无所不谈，唯独不触及哲学问题。

1825年10月巴伐利亚君主约瑟夫逝世，路德维希即位。这位新国王竭力提倡科学与艺术，想把慕尼黑建设成为文化中心。1827年5月谢林被伐利亚政府任命为科学中心总监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同时被科学院推举为院长，谢林此时是何等的荣耀显赫！作为负责科学事务的国家官员，谢林几乎每年都发表纪念国王诞辰的演说，赞扬路德维希是科学与艺术的保护人。从1835年开始，谢林还被安排给王储马克西米里安讲解哲学，谢林成了官方哲学家，成了钦命的“青年导师”。

谢林随着仕途的顺达，其哲学的保守方面日益突出出来，并占了上风。他背弃了早年的进步思想，转向研究“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主张哲学要为神学服务。晚年谢林的哲学抬高信仰而贬低理性，与科学和一切进步思想相对立，描绘出一幅从上帝中来到上帝中去的宗教漫画。

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后，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一直空缺。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要求的青年黑格尔派，向普鲁士制度的思想基础进行着日益尖锐的批判。184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邀情谢林来到柏林，主持柏林大学的讲座，以抵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谢林并没有完成普鲁士政府的委托，他在受过黑格尔哲学熏陶的广大听众中遭到了反对。黑格尔右派不赞同谢林，因为他们不同意他的神秘的天启哲学；黑格尔左派则公开批判谢林，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为基督教辩护。大多数学生和听众对谢林那些晦涩的玄学生论不感兴趣，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有人把他说成是“假充内行的人、骗子和蒙昧主义者”。有的学生甚至抢下谢林讲稿，在上面写下尖刻的评语。就这样，谢林结束了他在大学讲坛上的教学生涯，而只在科学院里进行工作。

对晚年的谢林，海涅作出了这样一个评价：“现在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学说，离开了他亲自奉献的祭坛，溜回过去信仰的厩舍，现在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宣传一个世外的，人格的上帝。”

恩格斯称谢林晚期哲学为“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的政治”，并且评论说：“……谁都不能在陈旧的、无用的破烂堆里认出从前的那只船，那只船曾经插着飘扬的旗帜以全帆在大海中航行，帆早已腐烂，桅杆

已经折断，浪潮向张开口的裂缝猛袭，并且船的龙骨日益被砂石掩埋起来。”

别林斯基则把晚年的谢林说成是一个“可怜的、虽生犹死的浪漫主义者”。

谢林就这样不光彩的结束了他的哲学生涯。

1829年10月，黑格尔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校长。1830年6月25日，黑格尔以校长身份，在柏林大学的大礼堂，向教授、学生、政要、教区领导发表拉丁语《纪念奥格斯堡信条呈递三百周年》讲话。在讲话中，黑格尔重申当代新教和普鲁士国家、哲学、伦理是一致的。普鲁士政府首脑承认新教的上帝观念这自觉理性之人活动的本质，历史的发展就这样通过和平注进而无需“暴乱”。鉴于黑格尔对普鲁士政府的恭顺态度，普鲁士国王于1831年1月授予黑格尔三级红鹰勋章。

1830年夏，普鲁士科学院院士选举会上，黑格尔未能入选。科学院院士这个学术荣誉地位，阿腾斯坦邀情黑格尔来柏林教时，就主动提出要设法给予。可惜，十几年来，首先是柏林大学校内反对黑格尔的施莱马赫在科学院颇有影响，极力反对他入院。近年，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学派势力壮大，施莱马赫稍有退让，却又遇上自然科学界、物理学家、数学家们不卖帐，黑格尔虽得政要的保驾也难以遂愿。这是黑格尔

在柏林唯一不如人愿的事情。真可谓，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世上没有真正的圆满。

1830年8月27日，黑格尔在荣誉的顶点度过了他60岁的诞辰。为了庆祝黑格尔的60大寿，他的学生们定制了一种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铸有哲学家的侧面像；背面则是一幅象征画：画的正中是守护神，右边是一个女性，手执体现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学究，他头顶还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据解释，信仰和智慧的结合便是这幅画的真谛。

1831年夏季，柏林霍乱流行，黑格尔与家人避居乡间。好多人被霍乱吓坏了，都远远地离开了首都。黑格尔61岁生日那天，前来道贺的友人寥寥无几。黑格尔的学生和热烈的崇拜者，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海因利希·威廉·奥古斯特·斯提哥利茨却在黑格尔的61岁生日那天给他的老师写了一首祝寿诗，题为《呈黑格尔》，内容如下：

在诸神下界的午夜来临，
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您精神王国的君主，
我不断地从内心，欢愉地
对您赞颂，愿师尊万福。

您并非形成王国的匠师，
也不是精神王国的霸主，
您是那些绝对准则的王公，
在时间里，万物都徬徨失措。
将来总会有一天，众人们，
把不渝的忠诚向您足前奉献，
那些无耻之徒，花样新翻，
和您相形对比之下，原形毕现。
各种公式已经及时制定，
诸般精神作出庄重保证，
现在它们已播散向四方，
仿佛在化妆歌舞队里进行。
可悲啊，人们却是自行其素，
可悲啊，您的同时代人，
竟忘记了您的真言，
去把放出来的魔鬼制服。
它们肆无忌惮地到处生长，
全无限制的遍地蔓延，
从那五色斑斓的海滩，
到俄罗斯中部的荒原。
敬礼，您精神的王公！
看吧，这样的时刻定会到来，
人们用奉献给上帝的双唇，

礼赞您师尊本人。
这是唯一四方传诵的真言，
天地的正气，威灵赫显。
它把空虚的假象从本质驱散，
把本质的宝座让精神永占。

(1 8 3 1 年 8 月 2 7 日)

次日，黑格尔作诗酬答：

友谊的祝贺呀，打动我的深衷，
这岂只是贺辞，而是庄严号令
去行动，用道理来促使大众，
至爱亲朋，齐备把胡作非为扫净！
什么是人们过错，你这样申申指责？
每个人都耳闻目睹，又何须惊怪；
这真言果然能把罪恶防止吗？
这是种工具，把更多的坏事招来。
我何曾不痛心疾首，但却劳而无功。
你的召唤，督促我把使命完成。
但愿哪，精神仍如旧日向我泉涌，
切莫空耗在无益的哀怨之中，
把希望带给人民，带给劳动！

人说，“月满则云，水满则溢”，“乐极生悲”，这个生辰及以前，黑格尔的威名显赫达到了顶峰，也正是这一年，黑格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因感染霍乱病逝于柏林。这位天分虽不高却一直都很勤奋的哲学家就此与世长辞了。德意志民族又陨落了一颗文化巨星。

黑格尔的学生遵照黑格尔生前的遗嘱，将他安葬在柏林市中心的墓地，他的近旁安息着费希特和布莱希特。